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64 期

64

吴建民：2014 年我国的外交

金立群：地缘政治经济趋势和中国的作用

Olivier Blanchard：世界经济展望：趋势和影响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五年三月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邮编：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Address :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ZipCode : 200023
Tel : 86-21-62188752
Fax : 86-21-62188714
WebSite : www.sdrf.org.cn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2009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三次学术研讨活动的记录，分别为基金会举办的第 101 期发展沙龙吴建民先生关于 2014 年我国外交的演讲，第 102 期发展沙龙金立群先生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演讲，还有“中国经济未来”系列座谈会 2015 年第 1 期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先生关于世界经济趋势的演讲

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建民作了题为“2014 年我国的外交”的演讲。他认为，在回顾 2014 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当中来吸取三条启示。第一条启示，要顺应历史的潮流。邓小平同志当年洞察了时代主题的变化，他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依靠战争解决不了。21 世纪，美国打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都没有好结果。我国之所以发展得好，就是因为我们顺应了和平发展共赢的世界潮流。第二条启示，要胸有全局。当今世界有三个中心。第一个中心，局部战争、冲突、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第二个中心，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第三

个中心，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东亚。这个地方拉动了全球 GDP 的增长，东亚没有一个国家不珍惜这个地位。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把破坏亚洲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政策，因为亚洲的增长是全球的需要。第三条启示，中国人现在一定要明确，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们应该清楚，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发展势头是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最大的利益，其他都是第二位的。要保持发展势头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中国一关门就无法发展。我们不能低估封闭的惯性。为了封闭，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舆论，就是夸大外来威胁。我们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要客观估计，实事求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们时代的潮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先生作了题为“地缘政治经济趋势和中国的作”的演讲。他指出，亚投行法定资本金定为 1000 亿美元，中国承诺最多可以出资到 50%，以后随着其它国家的参与，我们的股份将会慢慢降下来。我们不谋求一国独大，不谋求否决权。亚投行必须建立国际的治理结构，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来干，我们才有真正的影响力。我们现在成立一个银行，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制订治理规则，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意义很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 • 让 • 布兰查德（Olivier Jean Blanchard）先生作了题为“世界经济展望：

趋势和影响”的演讲。布兰查德先生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变动。好消息有二个，第一，油价下跌，主要针对所有进口国和主要经济体。第二，汇率调整，并将继续在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间发生。坏消息也有二个。第一，2014 年的数据更令人失望。第二，当国家意识到潜在增长下降时，投资将减少，不仅现在减少，之后也会减少。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他认为能有多强，便有多强。因为来自政策的后遗症已大部分消失，财政压力易处理，银行状况良好，企业债务低，资金流动大，总之一切正常。但欧元区和日本的境况则不容乐观。他认为，对全球 GDP 而言，石油价格的下跌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将激起非常积极的收入效应。一个典型国家的石油消费占 GDP 的 3% 左右，如果油价下跌，支付油气的费用会缩减，居民将享受到收入增长的效应。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他的观点是：在做好准备前不要开放资本市场。如果对此不谨慎，将成为远远超出控制的大事。在中国真正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之前，先要有一个强健的金融系统，即使这样，也可能依然会有一些对资本的管制。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目　录

吴建民：2014年我国的外交.....4

金立群：地缘政治经济趋势和中国的作用.....27

Olivier Blanchard：世界经济展望：趋势和影响.....35

提问与讨论.....54

2014 年我国的外交

吴建民
原中国驻法国大使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5 年 1 月 8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原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给我们做主题演讲。吴大使现在是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他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及外交战略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吴大使是国际展览局的负责人，为上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今天的演讲题目是“2014 年我国的外交”，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大使给我们做演讲。

吴建民：谢谢乔秘书长的夸赞，实在不敢当。今天我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刚才得知这次沙龙是第 101 次。在法国，有一次我问他们，你们沙龙是怎么开展起来？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法国在封建王朝的时候，贵夫人举办下午茶或者请吃饭，都在沙龙里面。沙龙这两个字法文是“大客厅里面”。他们告诉我，沙龙对于法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贡献很大。因为当时的统治非常严厉，但是在沙龙里面言论很自由，各界人士在这里聚会分享，于是产生了好思想。马克思也对启蒙运动评价很高。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这个运动，这个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们在上海搞这个沙龙，我很高兴来和大

家分享。

2014 年结束了，我们在回顾 2014 年的时候，可能需要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当中来吸取教益。我认为这一年是难忘的，有很多的教益值得我们汲取。为什么是难忘的？ 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甲午海战 120 周年。在 2014 年来临之前，2013 年，欧洲就传出一种声音，说 2014 年和 1914 年很相象，这话是很吓人的。因为 1914 年之前，当时的欧洲，包括英国和德国之间，经贸来往非常频繁，也不会想到打仗。当时英国的一个作家诺曼写了一本书，里面一个基本的观点是：经贸往来如此频繁，战争不需要打。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说 1914 年和 2014 年很相象，这个话的潜台词很吓人，又赶上甲午海战 120 周年，这一讲，我觉得有一种现象——不知道你们观察到没有——就是思潮。我今天在复旦大学聊天，他们问我，我们现在国家发展很快，外交也搞得很好，有什么不足？我说研究思潮研究的不够。这股大讲战争的思潮，特别是安倍去年 1 月 22 号讲今天的中日关系和当年的英德关系很像，各种媒体就跟着讲，然后形成了一种舆论：东亚地区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我不知道这种舆论，中国人听到有什么感觉？当时很奇怪，为什么就跟着讲起来了呢？说东亚这个地方最危险，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一股潮流。所以形成这个东西之后，全国很多地方请我去讲话，他们竟然问我，吴大使，是不是要打仗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这是第一次我被问是不是要打仗了。军队的人告诉我，因为这个舆论趋势，去年征兵都有点困难。我想去年这种氛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谈战争最为狂热、疯狂的一年。大家都生活在这种现象里面，包括电视台上一些军事专家都在讲打起来怎么样，双方武器怎么样，好像战争一触

即发，箭在弦上。我看到这个现象，心里很不舒服。

欧洲那些人说要打仗，到了年底都错了。什么原因？因为他们不懂亚洲。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对去年的形势进行反思，看能得出何种启示？我想有三条启示。

第一条启示，邓小平同志发现了时代主题的变化。1980 年代初，他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观点在当时提出，是了不起的变化。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毛主席挥之不去的忧虑就是战争，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今天的人听这几句话，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知道这九个字。因为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按照列宁 1916 年的论断，那个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邓小平后来发现，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现在这句话因为讲多了，变成套话了。我在大学里面讲，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套话。时代主题是什么含义？就是一个时代，当时的世界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时代主题指出了解决世界的大问题的途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谈判是没有用的，比如日本人打来了，怎么办？打出去啊，没有别的办法。再比如中国专制统治，改良都失败了，毛主席领导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时代主题。

今天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什么意思？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依靠战争解决不了。进入 21 世纪，美国打了两场半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打的什么结果？ 911 十周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跑到我办公室采访我，了解 911 十周年中国人有什么反应。他坐在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吴大使，你们这十年，发展得多好。这个话很对。下面一句话，我们美国人就顾打仗了。再下面一

句话，中国是 911 的最大受益者。我一句句评论他。我说，你说中国发展得很好，很对。2001 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是 1.15 万亿美元，2011 年的时候大概是 7.5 万亿美元；2001 年美国 GDP 差不多 10 万亿美元，到了 2011 年时候是 15 万亿美元。原来美国是我们的 8 倍，到了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一倍左右。他下一句话，你们是 911 最大受益者。我说我不同意你这句话，我说是你们逆了和平发展共赢的世界潮流，我们顺了这个潮流，不是现在，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顺了这股潮流。

不就是这样吗？有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人说，乌克兰危机一出现，又为中国赢得了 10 年战略机遇期。我去年年底参加一些会议，俄罗斯人也讲，乌克兰危机，中国是最大受益者。我说我听了这个话，很不舒服。我们怎么成为最大受益者？我们只是顺了这股潮流，关键是在这里。人家倒霉了，中国就好了？反过来，有一天人家好了，中国是不是就要倒霉呢？时代的主题是无法逆转的，我们顺应，就发展得好。战争还能解决问题吗？人类历史上多少年，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了的就通过打仗，打仗的后果双方也认了，多少年都是这样。甲午海战打完以后，割地、赔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把台湾澎湖列岛割出来了，赔了两亿两白银，一开始日本准备把辽东半岛割出去，结果这个消息一发布，列强向日本人抗议，日本人被迫说，辽东半岛不割了，再多赔 3 千万两白银。最后我们赔了 2 亿 3 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他们七年的预算，日本占了大便宜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割地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是惯例。21 世纪，美国打了这几场战争，阿富汗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喀布尔是全球第三大铜矿，美国人敢说都是我的？打了伊拉克，伊拉

克的石油资源全球储量第三，美国人敢说石油都给我？还有利比亚，敢吗？不敢啊。这个世界变了。

去年一年很多人讲，钓鱼岛打一仗，就可以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不懂时代主题。邓小平应该是最懂得战争的，他打了一辈子仗。当年看他的文选，我在考虑一个问题，他说，国际争端不能通过武力的办法解决，南海诸岛，包括钓鱼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不懂得通过战争把领土夺回来？他比谁都懂。但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看到时代主题变了。这就是我们汉书两句话，《汉书 • 董仲舒传》里有，“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就是反应事物规律的东西，它之所以很大，就是源于天——大的环境，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代主题变了，是天变了，道也得变。有些人鼓吹打一场战争就能解决问题，实际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我想请你们注意，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后，多次引用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场，逆之则亡。”去年年底，我去了中山故居，中山故居馆长告诉我说，习近平引用这个话，引用了七次。这是中山先生的至理名言，在 1916 年 9 月 16 号，他到浙江海宁看钱塘江大潮，大潮涌来，汹涌澎湃。中山先生这时候 50 岁，他看到钱塘江大潮，结合他对世界的观察，对中国的观察，提出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所以潮流不能逆。中央很清楚。APEC 会议开得很好，习主席和奥巴马谈得很好。习主席见安倍，当时板着脸，最后谈得还可以，能达成四点共识很不简单。四点共识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中国人该坚持的原则都坚持了。整个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反应是很好的。战争的狂热减退了。这种狂热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不懂得时代潮流，还停留

在战争革命时代，以为战争能解决问题。最后，中央为什么要和日本人谈？按照那时候说法，不应该跟他谈，打起来才好呢。那行吗？我觉得第一个给我们的启示是，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属于天的变化，道也跟着变，过去的道，战争能解决问题，那已经过去了。美国人打仗都不解决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还跟着？ 2013 年 10 月 1-16 日，美国政府关门 16 天，没有钱了。第一超级大国，怎么没有钱了？因为债务达到上限 16.7 万亿美元，如果再往上提，要国会开会通过。共和党控制国会，不批准，所以美国政府关门 16 天。美国如果不打这两场战争，那应当好过很多，两场战争花多少钱？美国人自己讲是 6 万亿美元。打仗不解决问题，打仗之后碰了南墙，中国人还跟着撞南墙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顺应潮流，潮流不能逆。

第二条启示，要胸有全局。要把世界放在心里来看。去年 12 月 8 号，首尔开了一个全球会议——世界政策会议，由法国人发起的。美国人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法国谁去的？这个人我认识，他当过密特朗、希拉克、萨克奇三任总统的外事顾问，被称为法国的金牌外交家，是国际关系界公认的大家。第一场会，我坐在下面的，他们讲欧亚的安全形势，两个人差不多一个调子。美国人说，亚洲有领土争端，欧洲没有领土争端，欧洲有安全机制，亚洲没有安全机制，结论是亚洲比欧洲危险。法国发言人当过三任总统的外事顾问，法国的外事顾问相当于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在法国地位很高，然后又当过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外交上最重要的职务他全干过。他在会议上发表一个观点，现在亚洲的问题，出现了新门罗主义。影射谁呢？影射习近平主席去年在亚信峰会的时候有一句话，亚洲的事务归根

结底要由亚洲人拿主意。他们说，这是新版的门罗主义出来了。

会场上我一看，当时我几乎是唯一的中国人，他讲完之后，我就举手了。我这样驳斥他们：你们看问题，就局限在一个点上，世界全局你们要不要看，世界全局是什么？世界全局有三个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是局部战争、冲突、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现在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打得一塌糊涂，全球大国在这里争夺，地区大国在这里搅局。教派冲突，什叶派和逊尼派仇杀，伊斯兰教里的两大教派仇杀起来很残酷。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在这里延续。全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地在中东北非地区，这个地区吸引了国际社会外交上的注意。因为这个地区动荡，又是全球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方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这样一个中心还不够吗？

第二个中心，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我最近几年，几乎年年去欧洲，感觉欧洲人对前途相当悲观。2014 年 11 月 9 号，我参加在柏林开的一个研讨会，戈尔巴乔夫讲了一篇话，他是会议的主席，讲欧洲形势，大家都很悲观。冷战结束 25 年了，看样子新冷战要爆发了。欧洲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美国复苏的势头还可以。2008 年危机是从美国爆发的，但后来转移到欧洲，为什么转移到欧洲？因为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我现在退休之后，参加很多国际会议，和欧洲政界人士接触很多，我问他们怎么会爆发危机？他们说欧洲代议民主制度陷入了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制度造成的。原来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有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每年政府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 3%，公共债务总量不能超过 GDP 的 60%，这很好。但是主权债务危

机一爆发，大家发现很多政府都超过了这个规定。因为竞选的时候，各方政客、政党领袖要选民投票，就允诺上台后给大家办什么好事，上台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借债，反正在台上就四、五年，还债是后人的事情。所以金融危机就转移到欧洲去了。你看现在欧洲领导人的注意力向内转了，欧洲原来在国际舞台上是很活跃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精力是搞欧洲内部的事。最近希腊又出问题，反对党如果上台，就可能退出欧元区，欧元区议论纷纷。

第三个中心，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东亚。过去几十年，东亚这块地方，包括中国在内，发展最快最有活力，这个地方拉动了全球 GDP 的增长。

你把这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会得出什么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中心，东亚没有一个国家想破坏这个地位。这不是发疯吗？我想没有一个国家不珍惜这个地位。第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集团，把破坏亚洲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政策。为什么？亚洲的增长是全球的需要。美国要进一步克服危机造成的影响，要靠经济增长；欧洲要摆脱危机的阴影，要靠经济增长；全球现在 28 亿穷人贫，要靠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把亚洲的增长势头打断，对谁都没有好处。第三个结论是什么？我们亚洲，特别是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中央做的论断是，21 世纪头 2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我在会上讲了这三条后，我就问美国人，你说亚洲比欧洲危险，我们亚洲这个地方是有紧张，但是没有打起仗，欧洲打起仗来了，乌克兰那里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打起仗来

了。他一句话没有说，虽然这些人都能言善辩，而且用英文来辩论，但是他却说不出来。我又针对法国人提问：你说出现亚洲出现新门罗主义，我说你犯了时代的错误。门罗主义是什么时候？是 19 世纪上半叶，今天是什么时候？是 21 世纪。19 世纪是列强瓜分世界的时候。今天是什么时候？是相互依存的时候。他也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这三个中心要全局看，胸有全局，才能看清局部。

第三条启示，中国人现在一定要明确，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去年 11 月 19 号，刘云山同志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我也去了，他叫我们对外事工作提点意见。我在会上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的外交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国最大的利益。21 世纪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明确了这个，其他就好办，大道理是和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邓小平做了论断，发展是硬道理。21 世纪，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我们大概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好的势头。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保持发展势头意味着什么？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中国一关门，就完了。

在座的诸位，我讲一点看法，我觉得我们不能低估封闭的惯性。每个人都生活在惯性之中，因为惯性是多年形成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有这种封闭的惯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在明成祖之后，中国走向了封闭。明成祖在位是 1402 年到 1424 年，中国封闭了快 600 年了，这 30 多年开放是新的事情，600 年比 30 年，600 年会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惯性。为什么封闭？封闭可以讲出 100 条好处，封闭好控制，封闭有助于稳定，封闭之后外来力量难以渗透等等。这些观点，改革开放初期都批过，今天有些人思想有回潮，说封闭

好。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明确讲了，开放后苍蝇蚊子会进来，但是新鲜空气也进来了。但是为了封闭，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舆论，就是夸大外来威胁。你看去年讲日本军国主义，好像就要复活了。我到美国去，见了鲍威尔，这个人很有本事，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得好，见好就收。1989 年 7 月，老布什派他到中国来，然后 12 月又来一次，小平同志亲自跟他谈。鲍威尔跟我说，你们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你们没有搞清楚军国主义是什么意思？日本军国主义当道的时候，军事占预算的 80%，军人说了算；日本现在的军事预算不到 1%，你说它复活了？这个是有点问题。关起门来讲，我们现在军事开支大概是日本 3 倍，我们军队 200 多万人，它才 20 多万人，他能打中国？我认为，必须把这两个分清楚：第一，全世界军队都要准备打仗，都要应付最坏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第二，我们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要客观估计，实事求是。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回过头来讲，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如果中国对外合作的势头中断了，对不起，我们这个发展的势头就中断了。

我觉得中央对这个非常清楚，历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表述。邓小平、江泽民说，和平发展是时代的潮流；胡锦涛加了一个合作的时代潮流，就是作的时代潮流，就是习近平主席说和平发展合作；习近平主席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我们时代的潮流。共赢这两个字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没有很长的历史。据我记忆，第一次是在 1999 年 11 月 15 号，中美两国达成了中国加入 WTO 双边协议时，江主席非常高兴，会见双方谈判代表时使用了这个词语，现在共赢用

的很多了。我前不久还见到 WTO 美方首席代表，他说我一辈子干成最大的事，就是和中国谈成了这个东西，中国加入 WTO 很了不起，这肯定是一个共赢的协议。龙永图在现场，他后来跟我们聊天，我们两个人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认识了，都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他管经济，我在安理会。龙永图说，江主席讲共赢，我太高兴了。我说你干嘛这么高兴？他说吴大使你不知道，加入 WTO 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外国人谈，是跟中国人谈，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他们从维护部门利益出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帽子很大。有一次谈判中美国人做了一点让步，龙永图提出是不是我们也让一点，实现共赢？龙永图共赢，中方一位领导马上严肃起来，拉长了脸，很严肃的对龙永图说：龙部长，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能共赢吗？这句话很厉害。现在江泽民也讲了，他不好批判了。但是想想，时代不变化，能共赢吗？战场上能共赢吗？革命能共赢吗？不可能，时代主题变化了，才能共赢。

中央很清楚，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发展势头是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最大的利益，其他都是第二位的。我在 APEC 会议前后去了国外好几次，大家对中国外交，到了年底的反应相当好，美国人甚至说，你们和奥巴马谈得这么好，出乎意料。过去有各式各样的批评，这次很好。回过头来看，还是要跟上中央的步伐，跟上小平的步伐，跟上习主席的步伐。我们要摆脱惯性思维，以前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还要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2014 年这一年，给我们启示是深刻的。王毅同志讲了，2014 年是中国外交丰硕的一年。这个话我觉得不过分。看各个领域，大国外交成果丰富，周边关系降温了。习主席提

出一个口号，很正确，结伴不结盟。我们现在正在编织一切伙伴关系网，和中国有战略伙伴关系的 61 国，和中国有合作伙伴关系的 17 国，加起来 78 国，伙伴关系网很厉害。我的看法是，中国正面临一个大潮的前夜。前不久我跟赵启正聊天，他说中国企业面临第二次大的生长期，就是走向世界。在座有些是企业家，我希望你们看准这个趋势，今天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一，我们有钱了。1978 年，我们外汇是多少？才 1.7 亿美元。现在光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将近 4 万亿了，还不算老百姓的。第二，世界的需要。第三，中国发展的需要。我们现在的发展是了不起的，但代价是很大的。有一位民营大企业家，到拉丁美洲购买土地。他跟我讲，中国租一亩土地，一年的代价是 1200 人民币；到拉丁美洲买断一亩地，是 3600 人民币。我们不休耕，田不断地在耕，地的腐殖质很低，只有 0.1%。褚时建改良土壤，花了很大的力气，腐殖质增加了，变成 3%。拉丁美洲的地特别，一般腐殖质 7% 到 8%，好的地是 15%。我们公布说，我们农耕地 20% 被污染，那个地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我有点怀疑。中国的出路就是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用起来，中国关起门来就完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一样。今天世界需要中国的资金，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是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走向世界要有好的理念。你们听说没有？有一个华坚集团，做鞋的，在埃塞俄比亚非常成功。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2010 年，当时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见埃塞俄比亚总理时说，埃塞俄比亚需要的是引进劳动密集型而不是高精尖的东西，那个总理听进去了。2011 年，他去了深圳大运会，他跟汪洋讲，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业公司？汪洋就推荐了华坚集团。民营企业动作很快，10 月份，

老总张华荣就带人去埃塞俄比亚考察，然后带回 80 人来中国培训。2012 年 1 月份工厂投产了，2012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造的鞋到了美国市场，美国人弄不清楚怎么埃塞俄比亚出口鞋到我们这里来了。听说那里去年是埃塞俄比亚出口最大的企业，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八分之一。华坚是两头在外，很多半成品从这里运去，然后在那里组装，市场也在外面，做得很成功。张华荣 1958 年生，当过兵。他总结经验说：以人为本，服务人类。我很钦佩。我的看法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光讲爱国主义不够，要爱祖国，还有爱人类。中国走向世界，没有一个好的观念不行。中国人走向世界，要高举服务人类，就是习主席讲的共赢。千万不要低估共赢这两个字的分量，共赢这两个字是新生事物，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都是零和游戏，我胜你败，我赢你输，我得你失。今天世界变了，共赢是非常强大的武器，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针。当然，公司也得盈利，不盈利就死亡了，为你公司盈利，为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你就能够经久不衰。我就讲到这里。你们诸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回答。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吴大使给我们做的精采演讲。他从我们国家 2014 年外交工作当中，总结了三条启示。第一，我们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第二，要胸有全局；第三，我们要明确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他讲的非常好，非常清楚。下面是提问或讨论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

乔军华：吴大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刚才也提到了，开放符合我们中国最大的利益。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到互联网的管制好像变得更加厉害了？以前上 Google，后来 Google 退出之后，我们上香港的 Google，现在香港好像也很难上了。

吴建民：互联网是一个新鲜事物，得管，究竟如何管，有什么规则，这是国际上大家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我想，既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适应它，管理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没有跟政府具体讨论过，但是政府肯定考虑过这些问题，是不是妨碍安全、稳定，有个权衡，孰轻孰重，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不是完全合理？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保持发展势头是中国最大的利益，用这个来讲的话，用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里的三个有利于去处理，有些问题处理起来的方法或者方式，可能有一定变化。现在美国人跟我们谈，说我们盗窃他的商业机密，我们也回应，双方就谈起来了。但 2014 年，美国起诉我们上海的五名现役军人，就走向对抗，就停下来了。去年 12 月份，在中央党校和美方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提出希望恢复。我就说，希望你们创造条件，我说还是对话比对抗好。不过我想这肯定会出现一个探索适应的过程。说白了，可能对我们所处的安全形势，要有一个全面的估计，这还是很重要的。在座的诸位，你们都有点影响，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把有些真实的情况向上面反映。

王勇坚：吴大使你好，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日本人与我们国家的关系也很重要，特别是最近安倍重新上台，我想请你预测一下今后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的发展走势。谢谢。

吴建民：预测走势很困难，只能讲大的趋势。大的趋势是什么？说到底，怎么看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我认为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的。中美两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直都说，中美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我们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是一个事实。安倍上台之后，最大

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安倍的三支箭，前两支箭还有些效果，第三支箭的作用好像不是很明显，去年日本经济又陷入了衰退。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怎么办呢？中国何尝不需要日本呢？我们现在一些短版，都是日本的长项，比如治理空气污染，它很有办法。另外就是对比中日间的贸易，2005 年紧张的时候，中日搞贸易战，究竟谁吃亏大？ 2005 年，我们经济总量还比它小，双方都吃亏，一定要说谁吃亏更大，可能是我们更大一点。现在来看，我们出口到它那里去的都是在价值链比较低端的，它出口到中国的都是高精尖的东西，你能都不要它吗？再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年 11 月 10 号，习近平要会见安倍？为什么安倍一定想见呢？双方都觉得关系再坏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走到一起来是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且我们的方针不是要跟它打仗，现在双方分歧管控也谈起来了。2012 年之前，两国军方已经达成协议，后来由于钓鱼岛国有化就对抗了。现在双方谈管控分歧，防止擦枪走火，擦枪走火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小泉纯一郎在任上的几年，两国关系比较僵。我们现在从 2012 年到现在，两年了，这次比上次僵的还厉害。以后当然会有一些摩擦，但是我觉得，决定两国关系的是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多寡。我认为历史问题的扯皮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但是，习近平主席去年 9 月 3 号的讲话非常清楚，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能延续。不能把当年日本人对我们做的坏事，都算在现在日本人身上，这个没有道理，那是他们先辈、军国主义干的事情，这是当时的情况。历史问题的解决还要有很长时间。习主席讲话，还是要高举世代友好，任何时候民间的工作不能放松。两国友好相处，这是我们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日本利益的需要。

再回头看，我们当年处理日本关系的时候，有利机会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出现过舆论，就是脱欧入亚。那时候鸠山由纪夫在台上的时候，小泽一郎带了 100 多个议员到中国来，当时美国很紧张，不过机会没有抓住。我想中央的方针是保持中日世代友好，这既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赢得人心，还能孤立一小撮右翼分子。中央依然是这个方针。当年毛主席开始，周总理、廖承志、陈毅，做日本工作做得多好，1972 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本老百姓的民意测验，多数支持邦交正常化。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日本方面对中国恶感上升了。但民意是可以引导的，民意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要做日本民间的工作，做日本企业的工作，日本企业界还是愿意发展中日关系的。

王颐：吴大使你好。习主席去加州，包括奥巴马来北京，都谈到新型大国关系。能不能请你讲一下，新型大国关系怎么理解？新在哪里？

吴建民：新型大国关系，习主席定义了三句话，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句话怎么解释？不冲突、不对抗，反应的是两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因为哈佛大学有个教授研究了新型大国的 15 个案例，11 个走向了战争，只有四个没有，所以他说，中美会不会重蹈昔日走向战争的情况？两位领导人说，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说我们不走战争的路。相互尊重是基础，不要说国与国之间，人和人之间，也要相互尊重。你们都有孩子，小孩也要尊重，和小孩的矛盾很多是由于大人不尊重孩子。小孩都有自尊心，国家何尝不是呢？合作共赢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途径，过去 30 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1971 年中美贸易 500 万美元，2013 年是 5200 亿美元，谁想到发展这么快，为什么？是共

同利益，合作共赢的结果。30 多年证明这条路能够走得通。去年我们在中央党校举行对话的时候，习主席讲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道理，美国方面有些人是认同的，有些人还有疑虑。但是我觉得这是中美两国所能够走的唯一符合双边利益的、符合世界利益的道路。我去年 10 月份到美国，基辛格请我们吃饭，他说美国哪怕是最好战的右翼集团也没有一个提出要和中国打仗，代价太大了。他说这一点你们得相信。我相信。从二战结束 45 年到现在，大国之间 69 年不打仗了。我看大国领导人，没有一个敢下这个决心。谁要下这个决心，不管是谁，就会被推上人类的审判台，谁要这么干起来，将来人类饶不了他。所以到现在，69 年不打了，如果 100 年不打，还能打吗？可能性更小了，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必由之路，现在，美国人有点疑虑。我去年 10 月份和美国民主党的智库谈，我跟他讲新型大国关系，他说：美国人有这个看法，你们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给我们吃安眠药啊？等我们醒来之后，你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有些疑虑。但我们要用实践，用中美关系踏踏实实向前走的实践来消除疑虑。奥巴马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奥巴马见习主席，最后一句话是我只剩下两年了。习主席回答说，两年也能做不少事。把中美关系搞好很重要，这对大局是有关系的。

乔依德：我有几个问题，最近网上看到汪洋在芝加哥的会议上有个讲话，大概意思是中美是重要的经济伙伴，现在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中国没有意愿和能力挑战美国，中国愿意在现在的国际经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不知道这个话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有，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到？

吴建民：我没有跟他去，我也没有看外交部的报道来核

实是不是有讲刚才这个话。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讲过。因为规则是西方制定的，这是事实。当今世界的规则是西方制定的，中国在规则中总体是受益的，我们 30 多年大发展就是这样。从中央开始讲这个问题时，都说我们是现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当然，现行秩序是西方定的，有些地方不够公正，应该慢慢通过改良的办法，逐渐调整。

嘉宾：吴大使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前两天，在法国发生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杀害无辜平民的事件，过两天之后，各国领导人在巴黎街头游行支持法国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但是新疆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我们很多无辜群众，但是在国际上面，没有像支持法国那样支持我们，你认为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建民：我想，第一，这件事情网上都可以看得见，这 12 个人就这么被打死了，而且打死的都是记者。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杀记者被认为是破坏新闻自由，这对他们来讲是一条底线，所以全世界反应那么强烈。中国的情况呢，滥杀无辜是相同的，但不是到一个报社把记者都杀了，全球的反应会有不同。第二，他们对我们的报道是有怀疑的，他们不相信我们说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报道。有些事情发生，他们没有人在场，我们讲了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怀疑。但是在昆明火车站的杀人事件，国际上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在新闻司工作过，中国对外国媒体采取一点行动之后，外国的反应特别强烈，我们这一点可能和他们的认识不大一样。各国体制不一样，法律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看法出现差异是必然的。还有不能不承认的，今天世界主流媒体是西方在控制，你说它的舆论完全客观，我才不相信呢。2014 年我参加一个规模不大的国际会议，碰到法国一个老资格的记者，

他是法国世界报的名记者，他说在法国讲真话是困难的，有时候同事会觉得讲真话是你对同事的威胁。西方新闻那么自由，也有很多问题。但这是它多年形成的一种观念。

高宏：我提一个小问题。我们国家说是海洋大国。你在法国做大使，法国的帆船运动非常发达，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帆船运动也开始发展。我今天提出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帆船运动在我们国家发展，在我看来最大的障碍就是政府。帆船运动员都知道，九龙治水，国家各部门之间有很多非常滑稽、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一些规定。船进到一个港口参加比赛，到下一个码头去都不许，全都在三亚一个地方，这真的限制了帆船运动的发展。从发展体育运动、体育产业来看，真是不好，我想借这个机会，引起你的注意，国家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改进？

吴建民：随便讲一句，汪潮涌在帆船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他参加了不少帆船运动，在世界上为中国赢得了一些荣誉。你想想看，中国开放才 30 多年，我们旧的东西都搞光了？差的远呢。中国三大惯性制约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大惯性，几千年封建的惯性，这很厉害，虽然是反帝反封建，但是现在中国社会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第二大惯性，封闭的惯性。第三大惯性，革命的惯性。鸦片战争以来，很多都是革命的做法。现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是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来看，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折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往往用革命的办法处理执政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自己观察我们社会，中国人必须警惕这三大惯性，我们改革开放，就是破除了一定的三大惯性，往前走了。中国继续往前走，要继续摆脱三大惯性的影响。

乔依德：我把吴大使在凤凰台和别人辩论的视频，调出

来看了，看了以后，我深受启发，同时也有问题，我趁这个机会问一下。第一，你辩论了以后，对这个辩论怎么看？我个人看了后，我赞同你的基本观点，包括你今天讲的。但是使我最吃惊的，并不是跟你辩论的人，他的观点我们也清楚。最使我吃惊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观察团的一个女孩子，她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她说吴大使，如果我们一直和外面经济交流下去，这个和平能维持多久？我一听大吃一惊，按照她的潜台词，好像马上要打仗了。这个我想听听你的评论。第二个，邱震海也到我们这里来过，他反复讲一件事，和平很好，但是可不可以用一种冲突的办法，使对方到谈判桌上来？我对他的想法也感到很奇怪。回到你刚才讲的很多东西当中，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也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现在的历史档案看来，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想打；现在 30 多年来，也没有一个国家想打，但是会不会由于某种判断，小的事情引发大战，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吴建民：你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辩论当中女孩子问的问题，和邱震海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青年人的国民教育是欠缺的。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我们历次党代会强调时代潮流、时代主题变化，这个教育我认为是欠缺的。过去两年，我到 20 多所大学去讲话，问大学生，你们都说世界变了，最大变化是什么？统领一切的变化是什么？只有个别大学生答对，多数都不对。教育这块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包括邱震海、罗援这些人的思想，就是犯了时代错误，天变了，道变了，他们把战争革命时代的天和道，来套今天，你说怎么行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千万不能低估和平发展这个时代的潮流。如果有一天出现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动武？即使会，但是我相信也不会打得稀里哗啦，总是马上有人出来调停，要求停火，两头拱，马上出面呼吁，为了人类的利益，坐下来谈。去年 11 月 9 号，我在柏林研讨会上，当年苏联的一个军人在场，他当时负责导弹部队的一个单位，荧光屏上面看到好像是美国导弹打过来了，他完全可以下令，马上打出去。但他判断荧光屏这个情况错的，就没有动。柏林研讨会上，人家很称赞他，说这个军人很了不起。这股大潮流来了之后，即便出现一些出格的事，也不会想一直这么打下去，总会有人尽快出面调停。谁要发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就像我刚才那一句话，谁要这么干下去，谁就会被送上人类审判台，人类是不会饶恕他的。

佘际庭：吴大使，你是外交家，今天能在这里和你见面，真是非常荣幸。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这个做法，我想日本人会不会并不像表面上讲的那样轻率做出这个决定？日本人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拿准了中国，他知道美国在旁边，中国不会牺牲发展的机遇，所以就这么做了，这里面肯定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最近孔子学院的事，瑞典说要关掉孔子学院。我们现在都讲软实力，为什么中国人在西方世界里建立软实力这么困难？我们孔子学院的做法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如果说，这作为一个连锁反应，中国政府能否意识到下一步其他国家的一些孔子学院的前景会怎么样？谢谢。

吴建民：关于和日本钓鱼岛的争端，作为一辈子搞外交的人，我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不感到一些遗憾。因为购岛，最早是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时候提出来的。据说是

美国人给他出的点子，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提了这个东西。最后，就是按照他这条路子去走了，他不喜欢中日关系好，我们最后就走了这条路了。外交上我认为，可能到一定的时候，需要反思。从日本方面来讲，胡锦涛主席当面跟野田首相讲，说你这样做不行。野田低估了国有化这几个字，在中国人中的理解和日本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野田跟我们解释，如果钓鱼岛让石原慎太郎买过去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是这样的，如果国家弄过来之后，我能够控制住，他当时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样会带来什么结果，他没有考虑到。所以这个事情呢，我相信若干年之后，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会分析当时的全过程，哪些方面做得对，哪些方面需要检讨。我写了两本外交案例，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把外交案例找出来研究学习。不能说任何事情都是中国人百分之百正确，也不能说日本人百分之百正确，我们的每一步是不是都很对，都可以预见这一点，我觉得回过头来，是有反思余地的。

第二个问题，孔子学院的问题，我想不要夸大出现的一点问题。我和施燕华 2010 年去孔子学院，我们两个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了六所大学，我们两个发表演说谈中美关系。就像自由论坛一样，参加的人都是自愿的。到芝加哥大学，他们说今天不能保证有很多人，结果后来走廊上都站满了人，中美关系人家还是感兴趣的。孔子学院发展这么快，什么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语言的兴趣上升了，要学中文，孔子学院也适应了这种要求。法国新任驻华大使说，现在法国好中学的标准是有没有开中文课。我们两个去的时候，站了很多美国人。我们 2010 年去，正是金融危机比较厉害的时候，他们说现在

失业很严重，但是缺少教中文的老师，孔子学院适应了这个需要。第二，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不了解，通过孔子学院，了解中华文化，这个需求当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我觉得孔子学院适应了这个需求。至于办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值得商榷，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考虑。我跟孔子学院提过意见，孔子学院的院长两年一换，三年一换，哪有这样的？我跟歌德学院的总负责人谈过，他说学院的院长，任期起码八年。我们孔子学院两三年，像走马灯一样，哪有什么长期眼光？换一个人，换一个主意。在座的诸位你们比我更清楚，就像今天中国有些地方官换得太勤一样，根本没有长远的眼光。到底怎么办？我认为中国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人家有些意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会形成一个大批赶孔子学院的潮流，我还看不到这样一个苗头，我是不是看错了，需要将来再看。我的基本估计是，有这两大需求在那里，人家反应也是不错的。有些办的好，有些差一点，但是这个是有需求的。所以总的来讲，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包括一些做法，院长的人选，怎么融入当地社会，我认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软实力，说到底人家得喜欢你。人家讨厌你，根本没法提软实力。好莱坞大片，谁强迫你看？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东西，人家喜欢。当然这个要克服种种障碍，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如果这个势头不中断，这一天会到来的。

缪其浩：吴大使，我想问，对形势安全的担心对我们所造成的冲击。我感觉，30 多年来，其实我们外交总的方向没什么变化，但是不时受到各式各样的干扰。最近我感觉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是信息安全的冲击，如斯诺登。包括您刚才第一个问题，互联网问题，我觉得和这个是有关的，这个

东西对我们影响很大。你从外交的角度，能不能判断一下，做一个分析，包括内政、外交，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把握好？

吴建民：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究竟做什么样的估计。我的看法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形势属于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最危险的是什么时候？是上世纪 60 年代，跟苏联闹翻了，跟美国人在越南打仗，那时候最危险。2014 年，听一些人讲，中国好像岌岌可危，三大岛链把中国封锁死了，好像不通过战争把钓鱼岛拿回来，中国人就活不下去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估计。我们 2013 年的外贸总额到了 4.2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出境的有 1 亿人。我参加有些会议，跟那些人讲，当年中国被封锁的时候，这个滋味你们没有尝过，我尝过。1961 年，当时上面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到塞内加尔去开会，当时还没有建交。驻几内亚的大使说，我见过这个部长，我给他发个电报应该没有问题，电报说中国有两个学生参加这个会议。这个电报不发还好，发了以后，我们两个一到机场，他们一看是中国学生，就不让入境。我们在机场休息室呆了两夜一天，然后坐飞机回去。我是学法语的，1961 年年底，巴黎开会，派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去，到法国使馆签证，被拒签。我今天和法国人讲这个故事，他们说不好意思，没有想到当年拒签的就是后来的中国驻法国大使。事实是，那时候中国人走不出去。现在有些同志说，我们要为资源而战。我们每年进口两亿八千万吨石油，可以国际市场上买到的，我们一年进口大概八千万吨粮食，也可以买到的，你还需要为资源而战吗？不需要，全球化了，我们在国际市场可以买到的。有些同志为什么还这样想，还处于战争革命时代的观念？他认为中国被封锁死了。其实远远不是这

个局面，因为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连在一起。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最坏的情况我们得考虑到，包括马六甲海峡，我们将来要采取一定措施，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还有一条路，这是必要的，这是另外一种估计。我认为，对安全形势的客观估计非常重要。颜色革命，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看法，包括我的看法，没有一个成功的。哪一个成功了？为什么不成功？时代过去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有信心。索罗斯都承认，他是惯于搞颜色革命的，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这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变化。现在我们中国很少从时代主题变化考虑，小平同志认为时代主题变了，这对中国影响很大。当时准备打仗，沿海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发展这个地方。改革开放前，靠近香港澳门台湾的地方都是前线。改革开放之后，那里成立四个经济特区，前线变成了地利。最大的例子就是 1992 年，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苏联垮掉了，东欧发生了剧变，照理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如果思想停留在过去，关上大门固守阵地，那是不行的。所以邓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发展证明邓小平的决断是多么的英明。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我们旧时代的阴影挥之不去。我长期搞国际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能够一挥就去吗？去不了。在座的诸位，你们都很有知识，我讲的是一家之言，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次荣华请我来，他请我我一定来，我们是好朋友，我很钦佩荣华的人品和他的胆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他请我来，我一定得来，讲一些看法，目的是供诸位参考，促进思考，最后正确与否看实践，实践证明对就是对的，实践证明错就是错的。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吴大使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演讲，虽说是一家之言，这一家也非常重要，我听了受到很多启发。他也指出来，2014 年，其实不止 2014 年，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说法，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对自己看得比较高了，对别人看得比较低，社会上面也有一些思潮。我想吴大使从他资深睿智的外交家角度，跟我们讲这些，对我们非常重要。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今天沙龙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参加。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地缘政治经济趋势和中国的作用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财政部原副部长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5 年 1 月 2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先生给我们做演讲。他的演讲主要讲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筹建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中国所起的作用。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金部长。

金立群：大家晚上好。我非常荣幸应邀，也很愿意跟大家交流。大家都知道，习主席 2013 年 10 月在巴厘岛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 2014 年 12 月 24 号，22 个国家参加了签字仪式，印尼因为尚无内阁部长，所以真正签字的包括中国在内有 21 个国家，此后不久，印尼财政部长到位之后补签。到今天为止，已经有 27 个国家了，应该说这些国家都是很踊跃的。亚投行的成员除了亚洲国家之外，世界上所有愿意加入的国家都可以进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多边投资机构，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亚行那样。

亚投行法定资本金定为 1000 亿美元，中国承诺最多可以出资到 50%，以后随着其它国家的参与，我们的股份将会慢慢降下来。我们不谋求一国独大，不谋求否决权。亚投

行必须建立国际的治理结构，不能说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恰恰是因为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是按国际游戏规则来干，我们才有真正的影响力。不是说亚投行提供贷款不重要，而是要看到，我们现在成立一个银行，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制订治理规则，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意义很大。

习主席提出要建立亚投行之后，我们开始先和东盟磋商。后来，我们就扩围，包括中东的海湾国家、中亚各国，并且还邀请发达国家参加。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和所有参与的国家完成了谅解备忘录的谈判，2014 年 10 月 24 日签字的时候，有 22 个国家。最近，新西兰签署了备忘录，作为一个本地区的一个发达国家进来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我们也都谈过了，这些国家各有各的想法。从态度上来讲，欧洲国家是比较积极的。

中国提出，在亚投行初期，中国承诺最高出资额可以达到 50%。这是为了保证这个机构由足够的资金运作。对此，参与谈判的国家和域外一些发达国家都有明显的担忧。他们害怕中国拥有 50% 的股份，一股独大。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反复强调，因为现在这个银行需要资本金，中国不出谁出？但是，我们不想谋求独大。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各个国家的利益。第一，我们是从事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帮助亚洲地区的国家发展经济，今后十年，亚洲需要大约 1 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数额之大，是世界银行和现有的所有机构都不能解决的。我们再成立一个银行，也是满足不了资金需求的，但是，至少我们增加了资金来源，能缓解对资金需求的压力。第二，我们在备忘录和章程的整个谈判过程中，始终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所以这一次，我们居然用了不到一年

的时间，就有 20 多个国家参与，现在有 27 个国家了。这充分表明，中国能够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而且真正是有担当的。担当领导是责任，不是特权，这个 leadership（领导）是 responsibility（责任），是 obligation（义务），而不是 privilege(特权)。我们把这点讲清楚了，付诸实施，很多国家也就慢慢放心了。将来，随着更多的国家加入，特别是域外大国的参与，中国的股权将会降下去。大概降到多少？据初步估计，有可能会降到 30% 以下，甚至是 25% 左右。那么，如果设定特别多数，假设是 70%，中国没有一票否决权。所以，虽然现在我们是拥有绝对多数的大股东，但我们不想靠投票来决定，而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

我认为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信任。开始时，我是中方组组长，现在是多边秘书处的秘书长。2014 年 10 月 20 日，各国财长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一致选举我为多边临时秘书处的秘书长。当时，我就表示，从今天开始，我不代表中国，我为所有签字的国家服务。对于中国在筹建和运行亚投行中的领导作用，各国还是认可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临时秘书处法律总顾问的任命问题。我们提出了请各国提名候选人的期限。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提名推荐我的法律总顾问。等我把任命的通知发出去之后，没有一个人反对。因为我选了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个女的，在世界银行干了几十年，在美国财政部当过律师，而且有些谈判代表还认识她。大家一看她的简历，没的话说。我们要广招各国人才，为所有的国家服务，而不是单独为中国服务。我们强调，到多边秘书处来工作的专业人员，不代表他们所来自的国家，而是为亚投行服务。接下来，我们大概要聘请 20-30 位中、外方专家。我们请的一些专家原来是在一些国际机构

工作，刚刚退休的、身体还挺好、经验也丰富。他们也不为钱，他们也有退休金，自己能再多拿一份收入，觉得挺好，而且主要是把这份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的使命和事业。

另外一点，将来这个机构的人才要全球招聘。有些域内国家也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认为域内国家没有优秀的人才，反正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如果说，因为美国不参加，日本不参加，或者英国不参加，我们就拒绝招聘这些国家的专业人才，那是自己损害自己的利益。亚行、世行、IMF 这些机构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大国，所以他们规定只有成员国的人才能受聘，限制非成员国的人才，对他们没有多大损失。如果我们这个银行只有 30 来个国家，不接受域外发达国家的人才，我们就很难充分招聘到一流人才。

再说招标采购，亚投行将对所有国家开放，价廉物美、服务好的，都可以参加国际投标。我们还在讨论，是否需要给予低收入国家的企业一定的价格优惠。当然，这里有一个“低收入国家”的定义问题。可以考虑采用联合国的标准。中国没有私利。所以我想，我们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急人之所急，能够真正想到他们发展的需要。

乔依德：不用我说，大家都会同意，金部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采的演讲。下面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徐明棋：有一个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周期都是比较长，大多数项目的回报率可能也不是很高，要保证这个银行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投资的形式和投资项目的遴选就非常重要。将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以贷款形式为主呢，还是购买项目发行债券，或者以其他形式？怎么样保证资金的可流动性？谢谢。

金立群：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管理模式，

我们没有常设董事会，省掉少说三分之一的成本。世界银行的运营成本占 30%，亚行占 25%。欧投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楷模，它只有 15%。现有的国际机构太意识形态化，养了一大帮人。欧投行和北欧银行没有常设董事会，非常精干。所以我说要 lean，一定要精干。在管理上，你如果发现开始臃肿了，你必须赶紧把臃肿的割掉，不能等它臃肿越来越多，等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那就割不掉了。我们这里没有职务虚的副行长，一定要戴上一个 O，戴不上 O 这个职位就不适合，比如 CFO（首席财务官），COO（首席运营官），或者再加上 risk manager（管风险的），法律总顾问等，就行了。不能设立一大批虚职。我们的融资成本在开创的时候，可能比世界银行和亚行高，但是，我们的运营成本一定比它们低。

还有一点不同之处，目前一些国际多边机构实施的是以国家为重心的模式（country focus），我们实行的是以行业为重心的模式（sector focus），这两种模式有很大的区别。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代表处有 100 来人，有事没事这 100 多人你都得养着。亚行驻中国代表处也有 50 来人。比如说，我们搞电力项目需要有电力专家，搞公路需要有公路专家，但不是年年都有电力项目，也不是年年都有公路项目，但这两方面的专家你得养着，这些专家们就锁定在中国代表处这个机构里面了。我们不是，我们不准备在哪个国家设立代表处，我们都是以部门、行业来确定专业人员的配置。比如说公路专家，他今天做泰国的，明天做缅甸的，后天做柬埔寨的，他总归有事干，只要不超出公路那个范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叫 sector focus。我们在管理上绝对不是照抄世行、亚行的，我们开始的融资成本会比这两个机构高，

但是，等到评级机构和市场看到了我们的业绩，看到了我们的效率，我们的融资成本也会降下去的。

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太多地去干预借款国家，尽可能让这些国家办好自己能办的事。否则监督和管理的成本很高。要发挥借款国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我们现在设计的管理方案，就是要吸取民营企业和世界上大的经营良好的金融机构的一些经验，再吸取世界银行、亚行的好的经验，结合起来制订我们的一套制度，我称为“21 世纪的公司”治理。谢谢。

缪其浩：今天的报告非常精采。我知道你原来是研究莎士比亚的，怎么会到财政部去的，而且干的这么好？

金立群：中国的教育是一个狭隘的教育，不是一个以人文教育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然后再发展专业的教育。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数理化不错，技术也不错，但是，有些人缺乏做人的最基本的人格，可以杀爹杀妈，可以拿刀把同学砍死。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的功利的东西太多，关于人文和道德（humanity）的教育不够。哈佛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人文教育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培养一个 whole person，培养一个人格完整的人。我呢，因为从小受家庭的影响，我就喜欢学习中国的文史哲这些人文的知识。我感到，这方面的教育对社会、对人各方面的发展比较完整，而不是逐利，老是想到自己的一些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学生再学习专业，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

我是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许国璋教授是我的导师。我经常回到母校参加一些活动，我常常对现在的学生讲，我们当年几位导师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是他们教我怎么做人。许国璋教授说，我不教你们英文，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

教你们一种方法，教做人的道理。许教授的教学方式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当然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在研究生期间就在国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他就希望我留校。我很荣幸，这是不容易的，所有家属在外地的同学中，就我留校了，其他留校的都是不需要办户口的、学校没有把他们爱人调到北京的责任。我那时候也刚刚结婚。许国璋教授和校领导刚刚决定让我留校，因为财政部要人，他就推荐我到世界银行。我就奇怪了，你到底要我还是不要啊？那时候国家教委拿到 2 亿美元，第一个教育项目就是 27 所重点大学。他怎么跟我说呢？他说，金立群啊，我们中国有 100 个英国文学教授差不多也够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没有金融经济方面的人才，更没有语言水平相当好的人才。然后他说，我希望你去，我相信你是可以转换这个角色的，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回来，学校总是欢迎你的。

我想，我总不能去了以后是一个 failure（失败者），这也不行。后来过了好多年，财政部的领导跟我说，你知道许教授推荐你时说了一句什么话吗？现在要是有谁给学生写推荐信，这个学生怎么出类拔萃（outstanding），怎么优秀（excellent），怎么非同一般（extraordinary），所有形容词全加上去，这种推荐信外国人不要看的。所以，有的学生让我写推荐信，我说你要让我给你写推荐信，你起草的信中所有形容词我全部去掉，因为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许老就跟我领导说了一句话：“我推荐的人，我负责。”其他一句好话也没有说。我非常感动，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所以呢，我到财政部以后，我的一个使命感是什么呢——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需要有这样一批人，有良好的人文教育基础，又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的人。专业什

么时候都可以学，但是像语言这种，属于 skill，属于技能的东西，应该从小就学。我们这代人有一个使命感，我在农村十年，我以为这辈子永远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居然我还能够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珍惜的。我的外祖母今年 108 岁了，她在无锡。30 几年前那个时候，她 70 多岁。她知道我要到世界银行，她说，我的外孙啊，你要管世界上所有的钱的银行了，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是公家的，一个口袋是私人的，你绝对不可以从公家口袋里拿一分钱放到私人口袋里去。我 30 几年没有忘记她这句话。谢谢。

乔依德：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金部长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的参加。

（应演讲者要求内容有所删减）

世界经济展望：趋势和影响

Olivier Blanchar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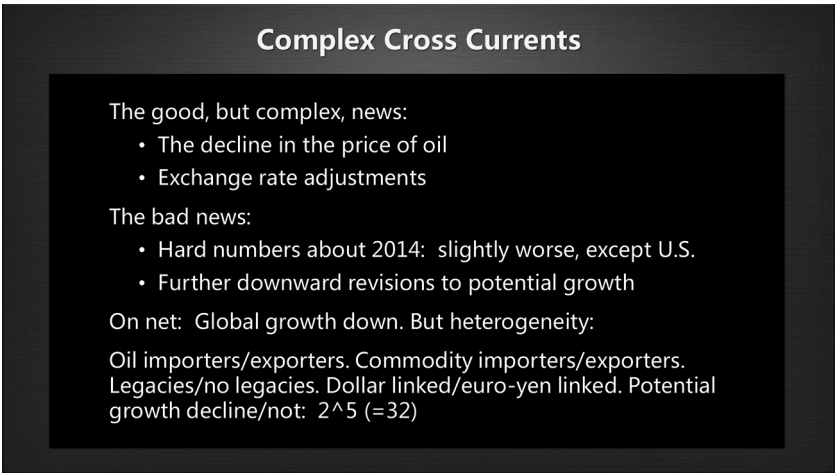
上海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　2015 年 1 月 21 日

徐明棋（主持人，卓越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我们十分高兴能邀请到 Olivier Blanchard 教授在上海为我们就“世界经济展望：趋势和影响”发表演讲。在他演讲之前，我简要地介绍一下，Olivier Blanchard 教授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我想他依然是法国籍，但他在剑桥大学和美国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他 1977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在哈佛大学执教。他 1982 年到麻省理工学院，与经济系的罗伯特 •M• 索洛教授齐名，并曾任经济系主任。他于 2008 年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研究过大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家，从货币政策的作用到投机泡沫的本质、劳动力市场的本质和失业的决定因素、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当前危机背后的力量等等。因此，他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共过事。他是许多著作与论文的作者，最出名的当属其撰写的教材，他一直在美国许多大学执教。现在就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他的演讲。

Olivier Blancha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非常感谢邀请。我们做了世界经济展望，这是关于全球变化的评估，我们通常在华盛顿发布，但这次我们决定在对世界

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中国发布。我们昨天在北京做了该发布。

在准备你们将在屏幕上看到的幻灯片的背后，我们做了大量工作。通常在我们公布被要求的文件之前，我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提交我对当前世界经济风险的看法。上周，我简要地将这些幻灯片提交给董事会。幸运的是，一周以来时局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些幻灯片依然是适宜的。现在我开始展示，希望将有时间讨论和问答。



在第一张幻灯片中，我尝试给出主题——复杂的现状。我认为这较好地说明了世界经济的情形：现状复杂但不糟糕，有许多力量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国家。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处理全球增长的数据，或多或少有一些相关数据。每个国家都有官方必须处理的问题。

我认为正在发生变动，好消息有二个。第一，油价下跌是重大利好消息，主要针对所有进口国和主要经济体。当我

阅读现在的报纸时，我认为报纸可能误导了一些事情。第二，汇率调整是好消息，并将继续在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间发生，美元增值，欧元贬值。我将会解释这些消息是好消息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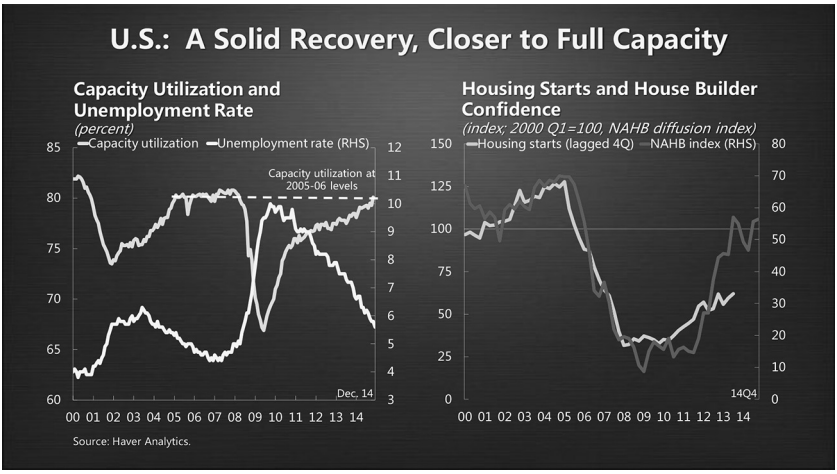
坏消息有二个。第一，2014 年的数据更令人失望，一些因素解释了为何它的表现不如我们的预期。这些将与 2015 和 2016 年相关。这次重新修正中，大量国家与我们预期的不同，他们的潜在增长下降，这对将来是坏消息，对现在也是。第二，因为当国家意识到潜在增长下降时，投资将减少，不仅现在减少，之后也会减少。现在预期潜在增长率更低，将导致对未来的预期也会更低。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投资出现困难。因此，有三种力量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国家。我们得出结论，坏消息在大多数国家占主导地位。有一些例外，美国经济仍然强大，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坏消息占主导地位。大部分预测修正是消极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仍然在下降。这里有两种情形。第一种预测相比 2014 年，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会更低。相比 2015 年，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更低。我们这次的预测结果里，经济更加恶化了——今年和明年的预测被修正得更低。我昨天在发布会中就这样说了，毕竟发布会要比预测修正来得更重要。我们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相较去年会增长。

我想指出数据在各国的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幻灯片显示对石油进口国是好消息，但对石油出口国是坏消息；对商品进口国是好消息，对商品出口国是坏消息；有些国家仍然要对抗一些后遗症如价格、高额债务、财政高赤字和高额国债，有些国家可能不再与这些后遗症有关；有些国家随美元

变动，有些国家随欧元和日元变动；对有些国家的预测被大幅改变，将其增长潜力下调了，对有些国家的预测则还在修正中。因此有了这些组合，得出的 32 种不同的组合数。实际上，这里的每一种代表一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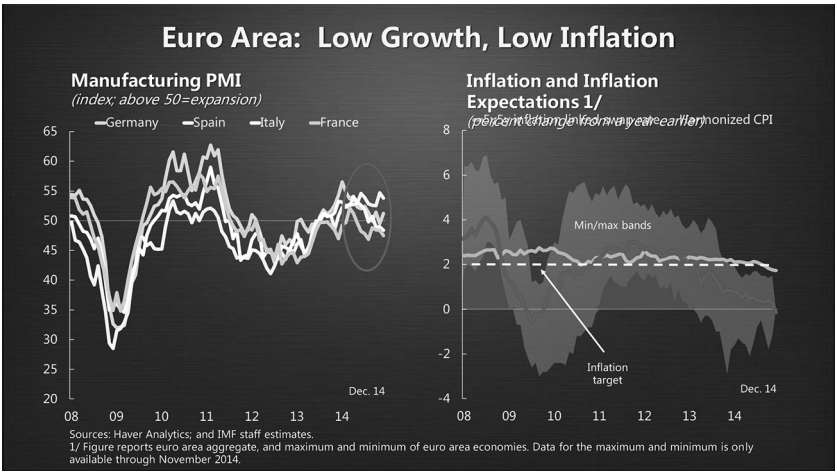
当你描述一个国家发生什么时，你必须掌握之前提到的所有要素。我将会给你们三张幻灯片，关于世界的主要区域正在发生什么。你们将从中获得许多知识，接着我将说明为何油价下跌和汇率调整是好消息，以及说明什么是坏消息。

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经济多强大，我认为能有多强大，便有多强大。来自政策的后遗症已大部分消失。财政压力易处理，银行状况良好，企业债务低，资金流动大，一切正常。这些可从图表中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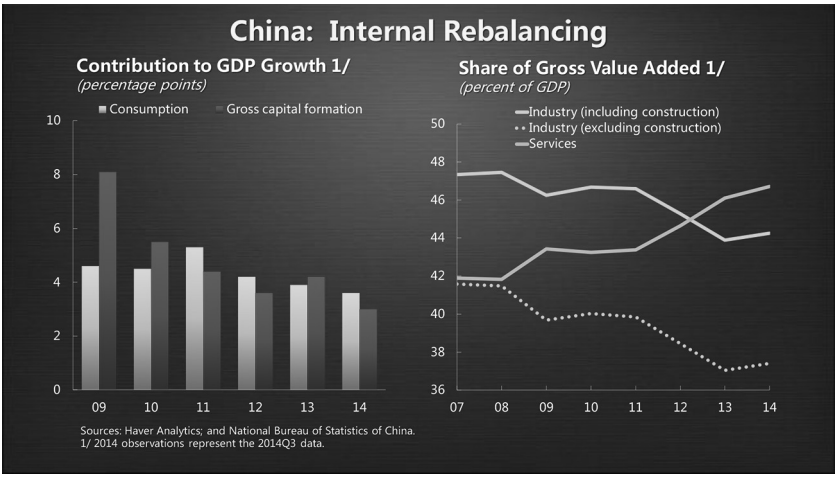
大家现在看蓝线，这是产能利用率，在次贷危机的风暴期间，产能利用率下跌了，但它现在反弹回来了。黄线是失业率，大家看到它上升但终究下降了。再要说的是，在美

国，房地产是引起这场次贷危机的主要行业之一。图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红色的房屋建造商信心指数，而绿色的是新开工的房产数量。典型地说，房屋建造商信心指数趋势许多年来都一直引领新开工的房产数量趋势。所以大家可见，这强烈反映了对新开工房产数量的预测。所以，看绿线如何跟随红色的信心指数趋势曲线，如果趋势是可靠的，那么绿线会继续跟随信心曲线上升。所以我认为美国会继续强势地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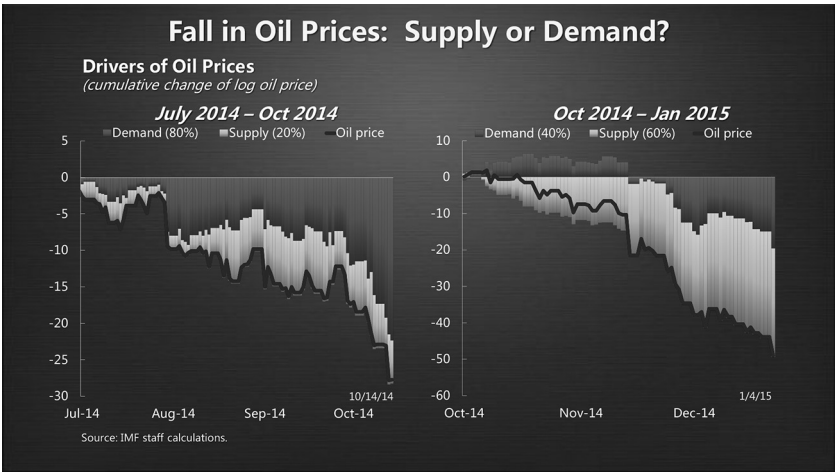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有两个区域的境况则不容乐观——欧元区和日本。欧元区的情况大家可看这幅复杂的图表（左图），大概说来这是制造业 PMI 指数。看看价格，大家看到反弹的情况不错，然后我们看到欧元价格又开始跌了。自 2014 年来，PMI 停止增长了，这些点或正或负起起伏伏，在最后面它又不动了。欧洲唯一表现还算不错的国家是西班牙，黄色那条线在 50 以上。

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事出有因。众所周知，目标通胀率是接近 2%。实际的整体通胀率是红线所示。大家可以看到它到最后是负值了。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由黄线所示，预期的是未来五年通胀率。大家看到这条线本来是在 2% 线以上，但却正在越过这条线。有的人担心它还会继续降。这样，通货紧缩便成了问题。



现在我又有张幻灯片，是关于中国的。但是，我并不准备告诉一些关于中国你们所不了解的事。这张图片很有趣。因为这是人们未能真正意识到的，中国的房地产热潮、房价下跌、投资下滑和影子银行业的程度。他们意识到了中国开始再平衡的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到，自 2011 年以来的三四年里 GDP 的下滑、消费的日益惨淡和投资的加剧放缓。消费放缓的速度比投资放缓的速度要慢得多。投资的减少才是坏消息。右边这张图大家也看到了，大家之前应该见过，这图是比较工业与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服务业是黄线，

工业是绿线。大家看到两条线交叉了，这很具象征意义。大家能看到这趋势是由基建这一块导致的。但事实上，即使剔除基建这一块（绿色虚线），趋势依然大体相同。显然，某些令人满意的事件发生了。这三张幻灯片让我关注到了故事中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油价开始下跌时带来的一个大问题是——记不记得去年 6 月油价是 100 美元，但现在只有大概 50 美元。下跌了 50%——为什么油价下跌了？是由于全球需求的疲软，是代表坏消息的指标扼杀了对大量石油的需求？或者是由于供应的方面，因为某些原因让供应增加，而导致油价下跌了？

这里是对石油供应量产生微小变化的数据评估。以下是我们研究的观察，基本来说我们观测的是股价和油价的交易行为。大家看到股票价格和油价每天的变化，如果两者都在上升，那就很可能是需求的因素，这对全球都是好消息。如果你观察到油价下跌，股价上涨。这可能是供给因素导致

的。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好消息。如果这两者同向变动，那就很可能是需求的因素。需求增长了，油价就上涨，然后股票价格也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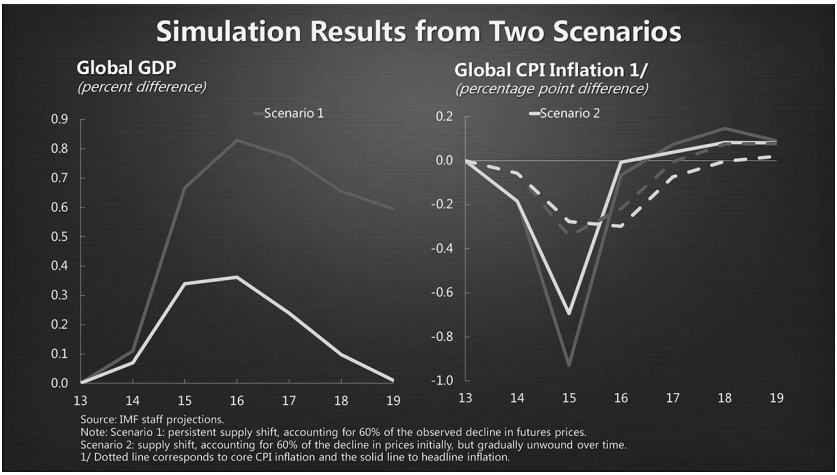
故事说完，让咱们回到现实当中。7 月到 10 月的这个夏天，红色部分是对需求的粗略的估计，绿色我们认为是对供应的估计。坏消息是关于世界经济正在导向低股价和低油价。但自 10 月份以来——大家看到的绿色的柱状图是供应——正变得更重要。在我看来，我认为这故事比数字所显示的要多得多。一些新的供油源，例如美国的页岩油，正在稳步增长。我们的假设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本可以用常规手段 , 限制石油供应来提升油价。但 OPEC 却决定不这么做，没有削减供油，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决定不这么做。这诱使了市场上大量的供油。所以，我认为大量的供油将持续，因为要改变沙特的做法，实际上要面对不同的办法。油价会持续走低，还是很快回到每桶 100 美元？我们的猜想是，不会很快回到每桶 100 美元。因为很显然，让沙特持续不减产的因素依然存在，对他们来说，通过减少供油来拉回油价的成本实在太大了。我们认为油价会持续走低。对未来市场我们预测，油价会从 55 美元至多回升到大约 70 美元。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油价是确定的下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供应增长所产生的供应热潮。这对于石油进口国这一整体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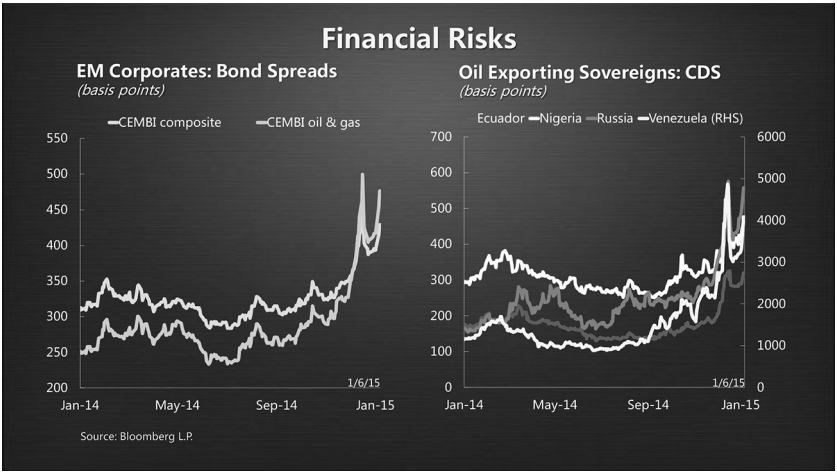
这是我们做的情景模拟，我展示了两个图表的模拟结果。第一个图是红色线，该情景假设供给保持到 2019 年，这是个好消息。蓝色线情景假设好消息没有了，潜在的石油供给变化也消失了。沙特改变其行为，OPEC 石油生产者减少供给，市场恢复高油价。很明显红线比蓝线更乐观。这跟

真实的世界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上可以从这个模拟图看到石油供给对世界 GDP 的影响。我们认为 2015 年世界经济 GDP 将会在 0.3% 到 0.6% 之间徘徊。

这是对全球 GDP 而言，然后你必须考虑到一些国家的实际对策。对于石油价格的下跌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将激起非常积极的收入效应。假如以一个典型的国家作为例子，所有消费对 GDP 占比在 3% 左右，一些国家可能会更高，比如印度、中国。如果油价下跌，消费对 GDP 的占比会在 1.5%，收入增长效应将被享受到，支付油气的费用也会缩减。1.5% 在收入方面是很大的增长，如果你采取财政扩张并减少税收，那将是很大的财政扩张，这是石油价格下降对所有的进口者的直接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因此产生的收入效应将被花费掉，也不是所有的效应都会到消费者手中。所以这个影响将会更小，这基本只是一个数字，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传统石油出口商与专业石油服务商相比，传统石油出口商的传统石油产品占比更高。所以对传统石油出口商而言成本相当高。显然对他们这是坏消息。一些国家很容易这样做，就像有丰富的财政资源可以维持消费的沙特、科威特那样。但是对于像尼日利亚、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来说，这却是个大问题。有些人担忧这些国家将会继续陷入麻烦之中。对于一些主要是开采石油的公司，非常规的石油开采，比如像开采油页岩，开采成本非常大。美国大部分的油页岩现在都是潜在的石油供给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合理的价格是在大约 60 美元。如果石油价格在 50 或者 55 美元，一些开采公司将会破产。我们认为这些影响都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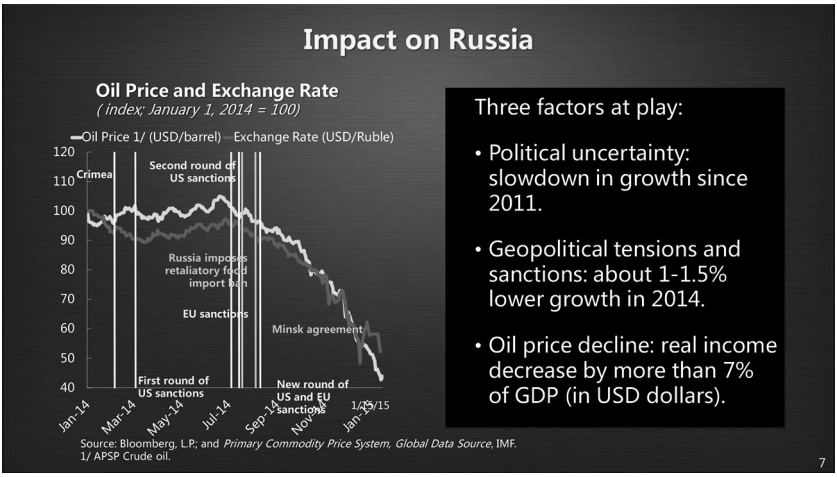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新兴市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债券息差的趋势。息差是这些公司要支付给投资者的风险溢价，这一直在攀升。相类似的现象在国家层面也在发生，如上图。你可以看

到一些国家像厄瓜多尔、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国。从 CDS 飙升上，可见存在一些风险。坐标轴右侧的黄线是委内瑞拉的 CDS，委内瑞拉的 CDS 非常高，但是并不是对所有出口国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况并不妙，它自夏季以来就不是很好。Minsk 协议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并且在 8 月减少了投资。对俄罗斯的制裁，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下降了约 5%，然后其石油价格也下降，甚至下降到极点，这个趋势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明显。你可以看到其收入价格下降已经超过了 GDP 的 7%，卢布已经大幅贬值，所以俄罗斯在之前就陷入危机，现在情况更严重。但是，从是否会酝酿成真正的危机来看，俄罗斯依然是稳健的。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石油价格的下降对收入的影响占到 GDP 消费量的 1.5%。我们认为中国当局想在石油价格下跌之际采取一些措施。他们认为房地产行业很不景气，他们可

能会做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信贷方面更宽松。我个人认为中国在石油价格下降之际最好不这么做，不要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中国当局可以维持较紧的信贷政策，这样中国仍然可以达到在 2015 年 GDP6.5% 的增长率。

第二个部分是汇率的调整部分，这个图表显示实际有效汇率，左边是发达国家，右边是新兴市场国家。你可以看到从去年的 8 月开始，美元从 6% 升值到 7%，白色代表的欧元从 2% 贬值到 3%，日元贬值了 10%。这不足为奇，因为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的阶段。美国最为强劲，其利率预计上涨；欧元区欧元和日元预测不会上涨，在不久的将来，利率会继续发生变化。对于新兴市场，中国较美元轻微贬值，俄罗斯已经贬值很多，并且印度也在贬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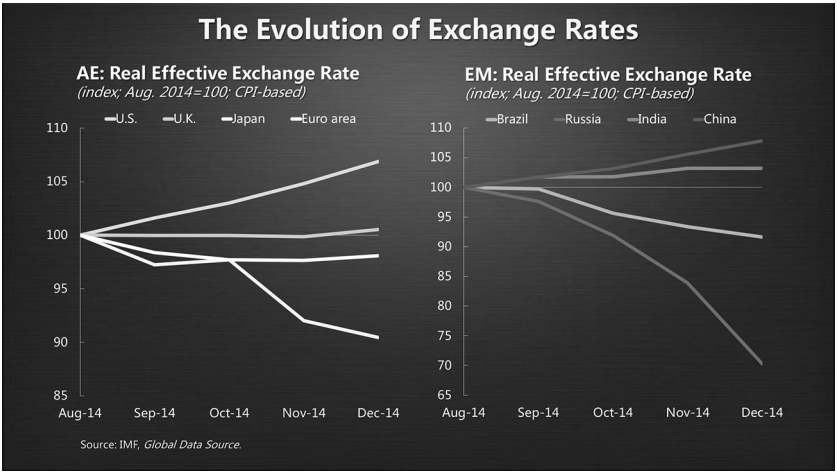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呢？一个国家受益，另一个国家遭受损失，这或多或少是一场零和游戏，但这个不是。因为唯一受升值之害的是美国，但同时美国正处在经济强力恢复期。如果经济增速下行，美国有许多工具可以向市场使用，比如推迟加息，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措施。对美国而言，升值的敞端是可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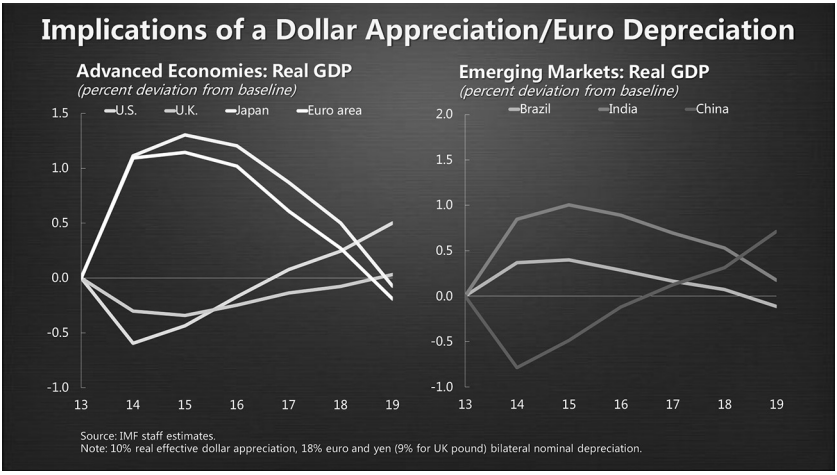
对于欧盟和日本，这是个利好消息，他们不需要采取任何手段，货币贬值的帮助很大，经济基本上是可以振作起来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好事情。

目前我们所做的模拟预测是为了得知：更大的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可能发生什么？模拟预测显示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10%，欧元、日元贬值 18%。这就是结果。

模拟情景中假设美国面对升值，会放宽货币政策，但相对于基线来说仍然不足以避免 GDP 下滑。你可以看到在黄

线表示的欧元区和白线表示的日本，欧元、日元贬值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相对于基线，GDP 增加超过 1%，这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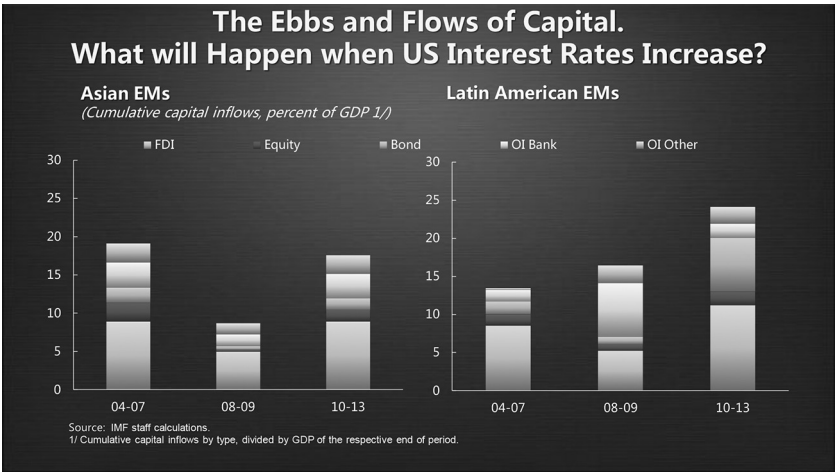




上边的图中，你可以见到，如果遇到实际货币升值

10%，中国像美国一样，也会出现 GDP 下滑。当然中国可以改变策略，不像美元那样升值。但是在我们的模拟中我们假设人民币采取与美元一样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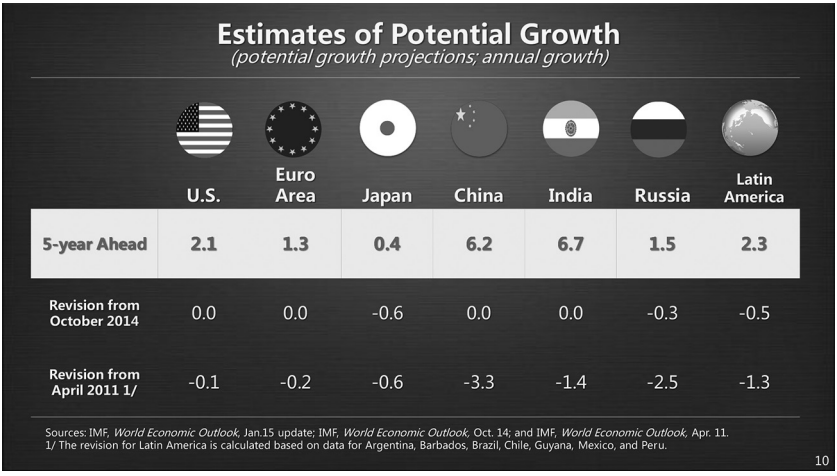
上述就是好的方面的消息，即：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时的汇率调整。我认为 2015 年夏天汇率调整政策会开始实行。



如果美国加息并且持续加息，那么我们可能看到资本流动。从现在开始我们假定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回美国，这将会让很多人担心。这些人的看法是，因为美国利率下降，所以资本流到拉丁美洲和亚洲。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投资机会更好。但是当利率上升，资本就会回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确定，如图中所示可能影响不会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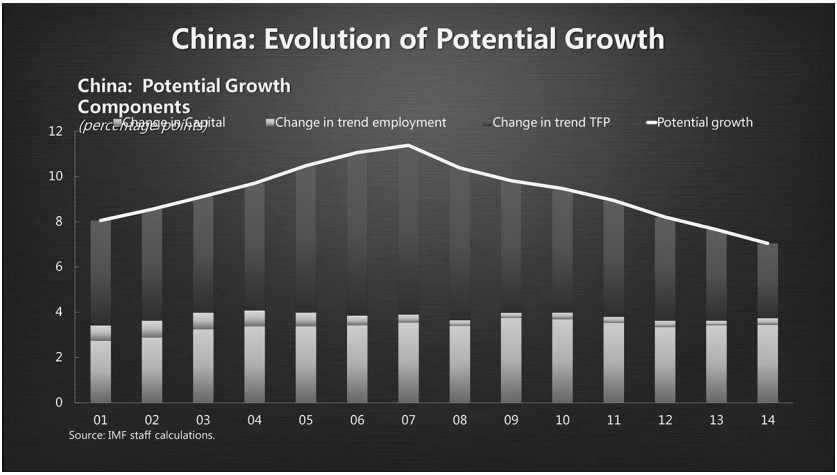
我们从拉丁美洲谈起。流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期从 2004 年到 2007 年。第二个是危机时期（2008 年到 2009 年）。第三个时期是 2010 年到 2013 年。因此，这段时间拉丁美洲资本是累积增加的。如果你看资本流动构成，最大部

分流入属于外债（绿色表示）。这有点令人担忧。这部分流入很容易流出。再看债券利率，如果其它地区的债券利率更吸引人，资本就可能流出。我们看拉丁美洲的时候，以巴西为例，他们需要担心资本流出。但对于亚洲，情况不同，有理由松一口气。第一，亚洲地区自 2010 年以来资本的流入较拉丁美洲小。中国没有这样一个趋势。第二，债券流入占比不是很大。这意味着资本流入亚洲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进进出出，可能呆更长时间。稍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结论的正确。有些人担心亚洲的资本外流，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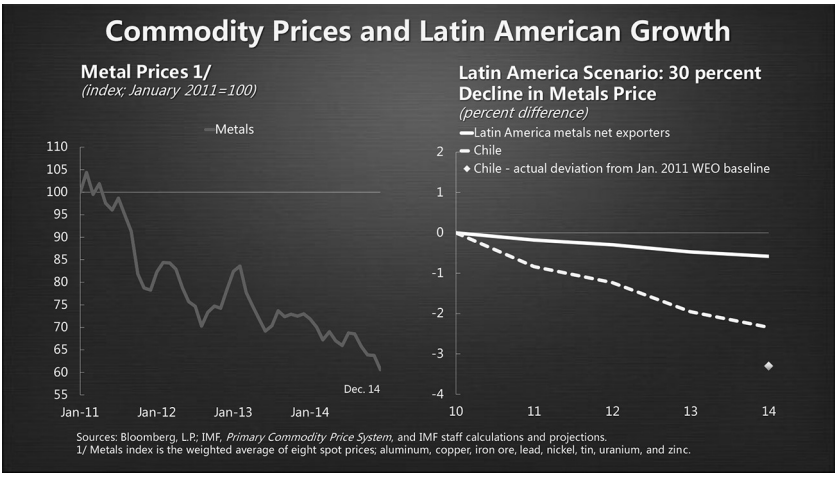
让我说说坏消息。主要就是潜在增长下滑的调整。如上图，第一行的数字表示未来五年各国潜在增长的最好预期。正如你们所想的，我们试图去预测可持续的增速。日本的数字非常低，欧洲和美国的数值也不是很高。再看中国和印度。增长还是很高的。中国的增长率是 6.2%，不是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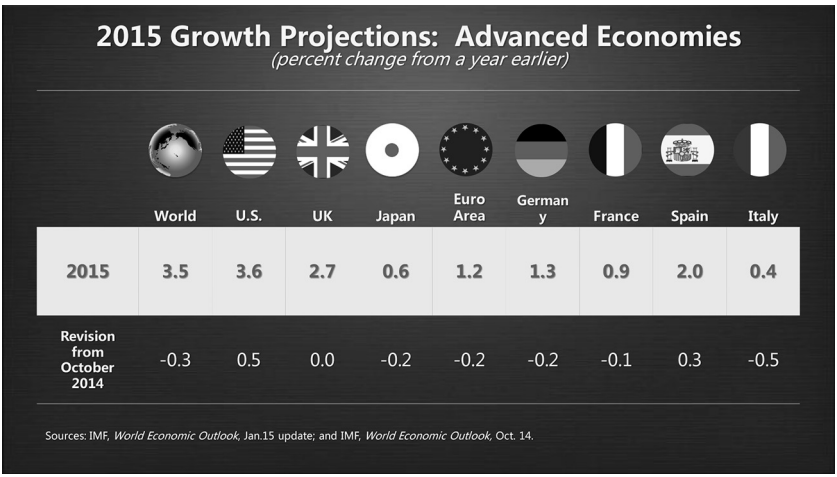
因为我们预期中国的潜在增长会降低，这是对上一次数字的调整。日本数字上是负的，从基本面上看，日本的潜在财富增长使得增速下降很多。俄国的情况不令人惊讶，数字是 -0.3，是一个较小的降幅，因为我们是在早些时候 2014 年 10 月调整过了。拉丁美洲的数字是 -0.5，稍微比俄罗斯大。上述是我们的最新预测得出的坏消息。这些数据取决于我们多大程度上修改和重估了 4 年前即 2011 年 4 月时我们对潜在增长的预期。你可以看到我们对 IMF 国别数据进行了多大幅度的修改。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幅度修改了潜在增长的各国数据。，这些修正的幅度还是很大的。显然有一些因素正在起作用。为什么数据这么低，这取决于各个国家。



比如中国，有两个影响因素。如图，第一个是全要素增长率在达到 10% 之后，可能会持续下降。再看服务业的反弹，服务业可能会有大的增长。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不会高。因此，对于中国，情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有一些

国家一鸣惊人。你看对拉丁美洲的修正。我给你一些拉丁美洲的数据，你会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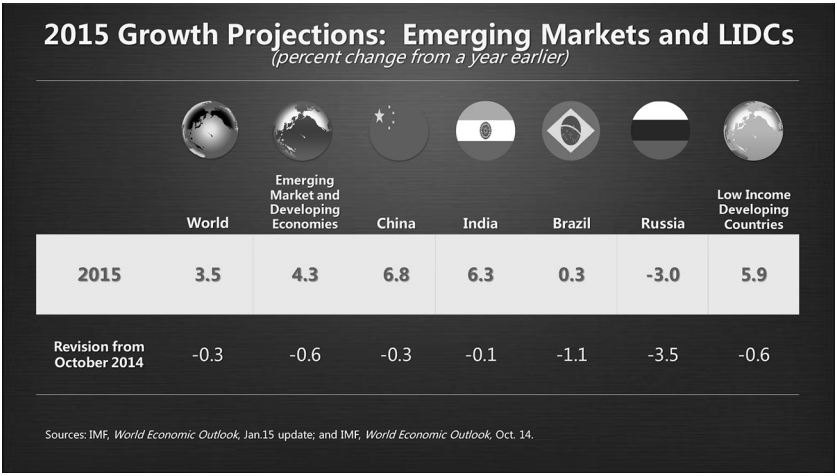




这些地区在 2010 年前半年做得很好。之后，每次修改显示它们的增长在下降。直觉可能告诉你，原因在于金属价

格从 105 下降到 60，这对于产品出口国是一个很大的下降。我们做了一个模拟，来显示价格下降对智利的影响（黄色点线表示。）你可以看到价格下降使得 GDP 降幅达 3%。作为一个产品出口国，当价格下降时，增长就会放慢。这个进程我认为已经发生，具体过程情况需要这些国家和 IMF 进一步观察。

我对于全球增长的预测有两张幻灯片，个结果是由于 2015 年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将非常缓慢，这是发达经济体的状况，接下去我将回到新兴市场的状况。



以下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预测结果，如我们所见，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是比上次差，这反映了一般情况下的潜在增长，俄罗斯正在下降。我有几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更多地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的。这是需求的增长，就如不增加额外债务的财政扩张，他们担心的事情是，这也降低了通货膨胀，同时石油价格也将影响

着 CPI。在一些国家，他们很快就将面对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担忧多的是，人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持久的问题，成为一件大事件。必须通过其他手段使货币保持宽松政策来防止利率上升。

因此，现在的挑战就是中央银行和发达经济体努力让人们明白通货膨胀不会持久。这只是由于石油价格的下降带来的一个短暂性的效果。对于石油出口国，他们将会有一段艰难的时间，他们必须调整政府支出，但政府的支出调整再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放下多少。

这些石油出口国已经从过去的高价格积累了大量资金，有财政空间来承受财政赤字增加，且动用这些资金来适应低油价下公共经费的逐渐削减。让实际汇率贬值将是缓冲低油价对经济的影响的主要手段。如果政府放任通货膨胀蔓延，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必须确保通胀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这是风险和成本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我认风险是：欧元区和日本十分萎靡，但底部已有所复苏。还有一些潜在的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地缘性政治风险，包括俄罗斯。如果不能得到解决，那将变得更糟。我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希腊大选可能导致一个完全翻转的国家决策。我担心，金融市场中已经非常低的利率使人们更乐于冒风险，所以有很多系统性的风险。我想会面临卖出风险，但他们并不担心。在美国的投资在增加，大家都知道机会的到来，但它仍然带来一些混乱。我们看到上周瑞士银行发生了什么，升值20%。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发生。我们认为金融系统可以消化它，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有种感觉，我们可能低估了油价下跌的积极影响。好吧，我就说到这。

提问与讨论

徐明棋：这是非常精彩的报告。我们听完他的演讲，也

读了 IMF 的简要预测更新摘要，我想邀请所有出席讲座的人员提问或是做一个简要评论，并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你来自哪里。

李强：我的名字叫李强，我在上海的一家美国法律公司工作。我有两个关于美国经济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在美国不断扩大的投资。作为一个律师，我看见在美国发生的经济活动从政治方面似乎更开放更吸引中国投资方。几年前，有好多资金涌向美国的房地产方面和工业方面。我想对中国在美国投资在恢复美国 GDP 增长的影响上有个大体的认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人们谈论美国的失业率在降低，这是非常健康的。有没有比较这代年轻人总体上与在职的这代年轻人在相对消费力和收入方面的数据？现在房地产价格美国仍然是相当高的，年轻人倾向于租房或与父母在一起吗？我只是想要知道关于美国的复苏的一个大致情况。

Olivier Blanchard：我的感觉是，如果这些投资是跨国界的，它是小规模的，大部分的投资基本是由国内企业完成的。我认为好消息是，复苏实际上是体面工作的增加。但如果你看人均收入在美国过去 20 年的增长，三分之二的增长归于 1% 的富人。你要问问自己，仅仅有利于富人的增长是否是实际增长？所以我认为美国复苏的质量是一个重要事情。奥巴马决定在大格局下，要求对富人征收更高的边际税率，这是件好事，这是应该做的。你知道，办法有两个，一是改变市场的工资，但这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或者是从分配下手。

Jian Zhu：我的名字是 Jian Zhu，我是上海大学经济系教授。您来上海访问，我有两个关于上海的问题。第一，上

海目前非常积极地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在美国利率走高、经济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应对资本市场开放中的金融风险？第二，关于金砖银行的总部设在中国，你有什么看法？谢谢。

Olivier Blanchard：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上海与世界的其它区域金融一体化是一件好事，金融一体化将带来许多益处。但从以往的危机中，我们也领悟到金融一体化将导致较大规模资本流动的出现。因此，我认为当你们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时，要预备好危机时刻防止资本流入流出的工具。资本市场的开放是非常微妙的，你们必须谨慎对待。所以我认为部分的开放还是不错的，但全盘的开放是危险的，你们必须要在开放前考虑周全。

关于金砖银行，总体上我们认为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将影响世界的其它地区。我认为区域安排将会增多，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单纯的区域化是行不通的，这需要其他人的参与，而目前没有制度设计方面的专家。我们对金砖银行的表现拭目以待。在区域间安排中，你们提供的资金和专家是令人满意的，这符合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

施宇澄：我的名字是施宇澄，是奥迈资本董事总经理。教授您好！感谢您的演讲。因为我只是一个学经济的学生，没有优异到成为一名经济学者，所以我不敢提问，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和触动，我只是对您的一些观点不太认同。您说奥巴马早些就应该提高税率。您是否意识到，标普 500 指数近五年的净利润增速是 GDP 增速的 3-4 倍？这表明央行主要政策鼓励公司回购股份，削减成本，这导致部分公司的股价非常高，每股收益非常高，但就业并没有被带起。所以如果您认为对富人征税能解决问题，

我对此表示怀疑。抱歉我非常直白，因为我是工作在一线的。记得我的朋友和导师，斯坦福大学教授 JohnTaylor 说，如果逐渐将利率增至高于名义通胀率 2%-3% 的位置，可能将引出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领年金者。当前美国的情况是，领年金者必须工作到 70 岁甚至 80 岁，因为他们的终身储蓄不够。所以这是一个税收与财政政策相关的问题。但我想多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您说对沙特来说减产的成本太高，我想知道为什么？您真的认为在沙特如此坚定地拒绝减产背后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最后一个问题是，请问您对瑞士央行近期决定作评论。就我看来，这不仅是宏观层面的误断，更是微观层面一个差的执行。所以我期待您的评论，谢谢。

Olivier Blanchard：你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你也知道不管我们同意与否，货币政策确实有一定副作用。通过减少债券的吸引力，使人们转移到股票，从而导致非常高的股价。你知道，我们在危机期间选择低利率也是别无选择，这就是副作用。随着利率的下降，这也给领年金者带来较艰难的日子，因为他们所领的是利息收入，所以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所谈的人均收入是近二十年的变迁，我们现在谈论的货币政策是近五年的事。这二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部分人口的收入都没有增长。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是接受还是采取行动？有两个方法可以去做些什么，改变经济市场的规则，也许这样薪资才会快速上涨，我认为我们应该试一试，但最终这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你是否使用财政再分配来试图抵消一些来自市场的不平等。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道德立场。证据是，针对富人更高的边际税率可能不会产生一些比如工作量减少等分配的负面影响。我们推行

的改革暗示，在对效率没有大的影响下，美国可以提高边际税率。

施宇澄：非常快地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如果说美国很有创造力，正是因为它不完全是一个福利国家而处于进步的状态。那么再分配到什么程度会扼杀创新？我很抱歉地这样说。

Olivier Blanchard：抱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论据是风险投资更多的是为了刺激而去创新，而不仅仅为了钱。但如果钱少一些，他们仍然会做。但是我们可以存异，专家之间往往有许多分歧。但我们必须对美国的不平等采取措施，就算不是为了其它原因，为了政治原因也要采取措施。

关于沙特阿拉伯，我强调的是经济方面。沙特以减产来维持 100 美元油价和现在的低油价相比，显著减少了沙特的收入。所以，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但他们没有这么说。这不是我的角色该说的话。我敢比较肯定地说，这背后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目前受石油价格下降影响最大的国家是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沙特是为自己这么做，或者是为了帮助美国这样做，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学家。

关于瑞士国家银行，你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回到刚才的问题，当你金融一体化后，市场把瑞士看作避风港，当然这也有许多好处，但当投资者期望规避风险时，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大幅地升值，从而扼杀出口部门。显然瑞士担心这一点，因此决定采取地板价干预，这个干预是很有意义的。为了维持这一地板价，瑞士央行要动用比他们预想中更多的累积储备，这个压力太过强烈了。因此，在某个节点，他们决定必须停止价格限制，所以他们停了下来。

一旦你决定停止，你不能预示市场你将要在三个星期内停止价格限制，对不对？它必须是出人意料的。这就是说，我认为有对市场破坏性更小的途径是取消价格限制。总体而言，我们现在打算取消价格限制，但我们将在预先确定的汇率出现时，继续干预。这样对汇率的影响会变小，对市场的影响将减弱。

但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要明白为什么瑞士央行把地板价格限制放在那儿，就能理解他们的停止。而一旦他们停止，它必须是出人意料。因此，现实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可能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或者是石油价格的下跌或者谁某处汇率的变动，或者是希腊。我认为，在金融领域认清风险的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做空瑞士法郎，你就可能会知道这些信息。

张春：我的名字是张春，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您对中国潜在 GDP 的预测。这是一个更多技术性的问题，我想知道它是否只是考虑关于 TFP、人口增长等的历史数据？你有没有考虑到潜在的结构性变化？我知道这是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提高利率时 , 新兴市场可能面临的资本流出。您研究了亚洲新兴市场，并说因为债券比率比较低，所以您不认为资本流出将是一个问题。但中国由于资本管制的存在，有些资本可能伪装成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所以我不知道您的数据是否考虑了这点？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您刚才提到 IMF 认为可以在一些情况下进行资本控制，您能告知我们更多的细节吗？例如，如果中国有大量的资金流出，什么特别的措施您认为是好的？无论是托宾税，或者是彻底地取缔流出，或者任何您认为合适的具体措施。

Olivier Blanchard：不错，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但都是好问题。对潜在 GDP，我要回去询问中国组他们是如何处理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一般情况下，预测是做自下而上做的。我们仔细的看了人口特征、资本积累量、各个部门的生产力。例如，我们预计服务行业的增速将比制造业部门快。这些都将被一一考虑进去。因此，在原则上，结构性变化应该体现在我们的评估中。同样，我也是从整体上来谈，因为每个组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但我觉得中国组会那样做。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可以找出更多细节。

关于资本流出，你完全正确。但是如果在资金不能购买债券而是伪装为外国直接投资，我不清楚中国有多少这样重新标贴过的资本，但我深知在巴西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情况。但我的感觉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比其它一些国家的开放程度更低。这种风险比在其它一些国家要少得多。

针对资本管制，我们的观点是，资本管制的基本情况是对资本流入的管制比流出更严格。从概念上讲，一些资本流入真的不那么受欢迎，它们可以被用来做套利交易，一些套利交易和一些非常高频的资本流动可以流入但不能流出太多。你们最好不要让这些资本流入，所以我们一直更多地努力对资金流入进行管制。针对资本流出，这个问题没那么明显。当人们带着资本进入中国时，你们可以告知，如果他们要带着资本离开就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懂得这个规矩，如果离开要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你们出乎意料地强制管制资本流出，则有违反合约之感。你们知道，这是不对称的。如果你让人们带着资本进入，随后说对不起不允许出去，那么这就是违背契约。他们会认为这样的

设计是违背契约之事。所以对资本流出采取管制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想法。在极端的例子下，假设你们遇到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状况，拿俄罗斯的状况来假设，当金融状况每况愈下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巨量资本外流。在绝望中，我们可能会想说："不，你们在这几个星期内不能取走你们的钱，或者类似的话。"但这不是我们谈论的关于美国加息的情况。所以在特定情况下，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主张对资本的流出加以控制。

马克•乌赞：我是马克•乌赞。我是重塑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和创始人之一。我可以添加两个简单的问题吗？一个是关于你所提到的，在美国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在美国已经看到新兴市场的资本逆转迹象，那么对于新兴市场中的石油进口国比如土耳其会是什么状况？也许市场看到了这些国家面临的风险较小，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资本流入石油进口国。另一个问题是，也许我们将看到更少的累计外汇储备，伴随着目前中国发展势头的减弱，伴随着像俄罗斯等完全缺乏外汇储备的石油出口国会出现什么结果？最后一个问题是，从您的视角，根据您在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请问对欧洲央行（ECB）的量化宽松而言，最佳框架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欧洲更多的是由银行系统驱动而不是由资本市场驱动。那么使欧洲央行工作为欧洲服务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Olivier Blanchard：我认为很显然，直接因素是资本的影响。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见解。是资本的影响使美国更有吸引力，使欧洲更有吸引力，使得油价的下跌影响到了所有的这些国家，但显然这也使石油进口国相较于石油出口国更诱人。

针对累计外汇储备，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事实上，中国的货币顺差更小了，也许这暗示着未来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速度会放慢。俄罗斯显然正在消耗它的一部分外汇储备。对此我没有做过数量的分析。但如果储备消耗慢，我会表示惊讶。我想在之前的会议上也提到过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累积外汇储备是非常低效率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所以你们应该更多地考虑通过央行给国家完成所需流动性供应等方法。

针对量化宽松，我有一些观点。首先，我认为欧洲地区量化宽松的影响已经发生。如我之前展示的，对它的预期已经导致欧元一部分的贬值。假如量化宽松只是导致欧元贬值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最有解释力的一个。另外，如我曾经在其它场合说过的，这一类量化宽松基本上是“黑魔法”。我的意思是，如果投资者认为它有作用，那么它就有作用。基本来说，德国债券的利率是非常低的，如果它们走低 20 个基点，也不能对任何事造成巨大的差异。但为什么它起作用？这是因为不知何故，许多投资者相信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是重要的，越大越好。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没道理的，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只要他们相信，他们据此而采取行动，那么他们会卖出欧元从而使欧元下跌。这也对欧洲有利。这就是量化宽松“黑魔法”的一面。你们能否设计出一个更具实际作用、较少“黑魔法”的量化宽松？我想是的，如果央行想要做的话，可以更直接地从影响信贷入手。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他们尝试了但效果不理想。他们能够做的是有限的。总之，我想量化宽松起作用了。问题是他们何时并且是否会宣布投资者或多或少期望知道的细节？如果结果是令人失望的，那么有些已有的效果将消失；如果结果带来一些

惊喜，将会有一些更多的效果。但我的意思是，总的来说，传统货币政策的运作是按照我们的理解而行的，如果你移动了利率，透过资本，这将会对投资和消费决策产生影响。但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很少按照我们的理解运行。我希望迟早我们将回归到央行使用利率等工具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不用琢磨这样的事情了。

胡一帆：我是胡一帆，海通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感谢您非常有见地的演讲。我注意到关于油价问题，你们预测的重点是 2015 年。我也很欣赏你们对于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模拟。我的问题是，回归到市场，大部分投资者认为油价不可能在低位持续很久。迟早油价会回升。他们想知道什么价位会是拐点？拐点是在何时？就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类似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利率走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您认为这将何时发生？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问题，与奥巴马昨天的演讲有关，奥巴马说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亚洲的贸易规则。我想这是美国首次提到美国要引领亚洲的贸易规则，他还提到如果中国主导，那么美国的工人和商业将处于劣势。您认为如何？他还说超过半数的制造业执行层说他们要积极地将工作从中国带回美国。这非常有趣，这是非常强势的位置。这与我们在近期 APEC 会议上所观察到的南辕北辙。我想听一下您的观点。谢谢。

Olivier Blanchard：我想拒绝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 , 我知道油价反弹的确切日期，但我不打算告诉你。对利率问题也是这样。关于油价，你可以通过观察期货市场来窥探至少一部分投资者的看法。绝大数人相信期货市场，如果你把这个作为预期的指标，基本上，投资者预期

油价将逐渐攀升至 70 美元。期货的曲线上扬的非常慢。他们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分析油价为何会下跌这么多的思路是，正如之前我们探讨的，维持 OPEC 限产对沙特而言代价不菲，所以他们放弃了。我不认为这点会改变。那么何时油价将回升？也许是油价跌到 50 美元的时候。这时许多其它供应方的开采已经没有意义。但你看，这个结果不太可能迅速发生，在美国许多页岩油在 50 美元的价格还是值得开采的。所以我猜测油价的下跌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正如我们得知的，假使中东发生些什么而后决定减产，石油价格将重回 70 美元或者更高，但这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你观察油价期权的分布，你可以发现 90% 的分布（我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引用，可能出错）在 30 美元到 80 美元，时间跨度为两年。我们不知道，我最佳的猜测是维持低油价绝非偶然。

对于利率，美联储暗示也许在年中的时候。我想这依然是最佳的猜测。他们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可以将调息推迟。我只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这意味着调息是在 6 月还是在 9 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没有任何差别。但如果你身处市场，你就要担忧这些问题。

胡一帆：您能否大体上就 TPP、RCEP 等区域贸易政策给一个评论？

Olivier Blanchard：我可以作一个简短的评论，我希望我们能达成 TPP。但是再重申一遍，我不会对奥巴马的言论提出评论。

黄琛：我是黄琛，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教授。我非常享受您有见地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我想知道全球化是否对其它小国像它对中国一样重要？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小国也许没有。第二个问题与教授您之前的一个

问题相关，根据我的理解，中国政府对开放资本市场非常小心翼翼，对资本市场监管严格。您是否认为资本控制对中国真的有利？谢谢。

Olivier Blanchard：毫无疑问中国的增长大部分归功于全球一体化。对贫穷的国家而言，奥秘是从价值链低端开始，学习技术并往上移动。这正是中国已经在做的事，而这必须要依靠贸易。你们要为发达经济体制造产品、复杂的产品，然后你们从中学习，并沿着价值链向上。如果你们是封闭式经济，当你们贫穷时，你们是为穷国制造产品，这不会给你们带来进步所需要的知识。有许多探讨这一话题的书，但我想中国无疑最好地验证了全球一体化的益处。你是否想问，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全球一体化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显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会是你们最终能供应给世界的东西。

关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是的，我认为经验是，在你们做好准备前不要开放资本市场。迟早你们将开放资本市场，这将会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如果你们对此不谨慎，这将成为远远超出你们控制的大事。资本市场开放将对金融系统造成巨大的责任。所以在你们真正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之前，你们要先有一个强健的金融系统。即使你们那么做了，你们将依然希望有一些资本管制，一些有限制的资本活动。

丁剑平：我叫丁剑平，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我在你的讲稿里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你提到如果美联储真的提高利率将有重大影响。例如，美元将进一步增值，原油价格将进一步下降，所有押宝美元的亚洲国家会发现他们不能进一步提高出口。一些国家如日本，他们会深陷泥潭。并且欧洲面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这种情况就像是 1997 年的亚

洲金融危机，亚洲国家押注美元，美元升值，而日元贬值。欧洲有和日本完全相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似的情况会发生？在今年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发生？

Olivier Blanchard：对不起，我强烈反对你的消极态度。我的感觉是，基于历史上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能被预测的事件。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不久利率会增加。是否会在6月增加，或7月，或9月，我也不知道，但它正在发生。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你已经意识到了，大家都知道机会来了。这已经反映了美元的升值，欧元的贬值，日元的贬值，这在美元的年度曲线走势中已有所反映。我的猜测是，除非他们做得很差，否则这不将成为一个大事。美元走势不会有太多的波动。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小的事件，所以它也绝对不可能和1997年一样。但是，它已经带来了美元的升值，导致了外币的贬值。这影响了日本，这影响欧洲货币。但它正在发生。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会真实发生。所以我想说，不要紧张。

你知道，好像人们都在关注这一事件，而并没有人在关注瑞士法郎，对吗？我认为瑞士法郎的变化比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事情都要重大。为什么这样说，你并没有意识到很多事真在悄然发生。有些事件会发生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事件。

刘海影：你好，我的名字是刘海影，我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我的问题是关于技术方面的。你能告诉我们关于你的预测模型的更多细节？你提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前台。您是用哪一种模型？它是一种VAR模型，还是DSGE模型？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预测，如果是

这样的话，我们要向哪个方面努力去提高？谢谢。

Olivier Blanchard：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我们是如何做预测的。我们要做的是，一开始由模型团队从模型库中选取模型建模。大多数模型有一个特定的区域，Dow Jones& Equivalent Models，DSGE。这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基础。建模团队看结果是否合理，把结果发送到研究团队。然后他们告诉我，看你的国家可能正处于怎样一个全球增长的环境，美国的增长是怎样的。这些给予的假设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将会发生在你的国家。反过来，这就是我们预测的将会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

然后我们来看，研究团队的回应是否与最初的模拟相符合还是有差异。然后召集研究前台和模型团队来商议协调。一般情况，这样的会议开一次或两次。最后就成为我们的预测结果了。这是一种混合的方法，前台的介入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个识别的问题。如果做预测但没有识别这一步，你会遇到大麻烦。是否信息源自于前台或者后台？我们是否做到最好了？我想说相比于其他人，是的，我们做的很好，但我们是否能做的更棒？我想是的。比如，在这一轮讨论中，有许多关于油价的效应，我和我的模型团队发现这个效应是相当大的。但是当他们问研究前台："面临油价下跌，你们会修正多少经济增速？"我得到的回答是非常小的。这引发了许多探讨。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说服前台，尽管我认为我是对的，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影响将扩大。但这是一个过程，是模型与源自前台的信息相互影响的过程。是的，我正在花时间思索我们是否可以做的更好。但这是必须要从前到后来做的。

王涛：我是王涛，来自兴业证券。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美

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因为我注意到，美国约有 23-24 亿元的全球资产，对外负债约为 30 亿元。你提到你希望美元依然保持强势。你认为这在经济上对美国有什么的影响？

Olivier Blanchard：这将使美国的资产状况更糟，但我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不会破产，也没有任何其它国家可以迫使美国平衡所有这些负债和资产。美国对储备货币的垄断吗？不，这不是垄断，是人们愿意持有美国资产。所以如果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你，为什么要说不呢？法国人发明了“过分的特权”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因为你让你的货币、你的市场很有吸引力，所有人们愿意持有你的资产。我认为中国应该做同样的事情，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其它国家也应该做。这不是过分的特权。它基本上具有很好的市场效果，所以没什么错。

徐明棋：好，我想我们的提问就到这里。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向 Blanchard 教授再次致以热烈的掌声。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